

四

伪满宪兵、特务

抗日战争纪念馆

抗日战争图书馆

鞍山日本宪兵队

鞍山市政协文史办公室

日本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设置在东北各政治、军事、经济要地的特务组织；是对中国人民施行法西斯统治，进行血腥镇压的机构；是对其管辖境内的保安局、警察局、铁路警护队、警务统治委员会等及其所属特务组织的“太上皇”。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宪兵司令部即配属宪兵于“满洲派遣军”中。1906年成立了“关东宪兵队”，隶属日本宪兵司令部领导。1931年9月21日，关东宪兵队升格为“关东宪兵司令部”。下辖旅顺、奉天（沈阳）、长春、安东（丹东）4个宪兵队。不久在大连、辽阳、公主岭等地成立了宪兵分队。鞍山、抚顺、本溪、铁岭等地成立了宪兵分遣队。

鞍山宪兵分遣队，是鞍山地区的日本特务组织中历史最长，组织最大，活动最为猖獗的主要特务机关。为了适应形势，加强对我国人民统治的需要，而先后进行了3次改组和扩大。1936年4月设立奉天宪兵队鞍山分遣队。同年升格为鞍山宪兵分队。1939年4月又降格为鞍山宪兵分遣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美机B29轰炸鞍山。社会秩序动荡，敌伪统治不稳，根据当时形势，又升格为“鞍山宪兵队”，下辖鞍山、营口、本溪、安东等宪兵分队及辽阳、海城宪兵分遣队。鞍山宪兵队本部设有：战务课、警务课、经济课、自行车队、鞍山昭和制钢所宪兵诘所、鞍山车站宪兵诘所。

战务课，是宪兵队组织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课。课内分

“国民党系统”（重庆系统）、八路军系统（延安系统）、社会一般阶层系统、机关、团体、宗教系统、厂矿系统等。特高科也划在战务课内。其中有一部分人负责特事工作。除这几个系统外，下设内勤、外勤两个系。内勤系下设取调（预审、传讯）和邮检（检查信件、邮包）两个班。外勤系根据地区划分，下设市、郊区，立山和千山，刘二堡和腾鳌堡，昭和制钢所四个班。战务课的任务，对外搜集防范敌对国家的谍报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的有关工作，对内搜集社会思想动态和在伪军中的所谓“反满抗日分子”、“战时危险分子”的情报和有关方面的工作。警务课的任务，督查军风纪、总理军事、刑事案件工作。经理课的任务是管理庶务、财务、人事、医务等有关工作。

鞍山日本宪兵队，豢养了大批特务，大量雇用宪补（中国人）、宪兵补（朝鲜人）、翻译、“嘱托”等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此外，还雇用大批爪牙和狗腿子，其中有的由宪兵队直接采用，这样的人地位高，每月发给活动费，并给证件。联络员（腿子）是宪兵、宪补个人采用的没证件。活动时利用主人名片上写“×××系本人联络员，希军警及机关人员多加关照”字样。他们没有工资，主要靠通融贿赂、敲诈勒索为其生活来源。凡是中国人当宪补的，都编在特高科，其他课都是日本宪兵。翻译都编在庶务系里，如审讯案件需要翻译时，可临时调配。宪补是直线领导联络员，密侦与联络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翻译很少使用联络员。为严密执行“谍报防卫”任务，把这些人分布在各个角落，广泛组成了情报网和活动据点，在昭和制钢所内（即今鞍钢）建立公开盘查工人的宪兵分驻机构的宪兵派出所，采取各种手段，疯狂镇压工人运动。还在弓长岭，大孤山、樱桃园等矿山，以及铁路、车站、码头、机关、学校、后天道、家理教、千山佛道教会和社会各复杂场所，安插密侦和联络员。

并设有“六四部队”（日寇抓劳工的组织代号），及“八六部队”（专事探测可疑电波的特种组织），派邮检班宪兵常驻保安局、邮局、电话局内，从事信件和邮包检查与偷听电话、刺探我东北抗联的军事活动、地工组织、政治经济等各种情报。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鞍山地区（包括辽阳、海城）活动过的特务达291人，其中日本籍117人，朝鲜籍3人，中国籍171人，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每个宪兵，宪兵补及宪补所领导的联络员，少则五名，多则二三十名。

他们使用的特务手段极其阴险毒辣，使用的特务方法极其隐蔽狡猾。首先是凭借宪兵队与犯人之间特有的震慑能量，采用先拉出来，再打进去的方法，抓住其弱点进行收买利诱。如在某些要案中，选择无关紧要人物做假释放（暗地保持监视），用给金钱或物资，找职业，谋生活出路等手段，收买他当腿子。让他仍和原案中的人接触，保持联系，从中做密侦工作，再秘密向其主子汇报。主子根据情况作新的布置，直到一网打尽。再如抓到“贩毒犯”，为了收买，捕后不关押，不判刑，同时还支持他继续贩卖大烟，并为其提供货源，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利用犯者无限感激的心情，使其在收买后，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甘当腿子尽忠效力。再如利用“特业”，包括大烟馆、妓馆、旅馆、饭馆、澡塘子、影剧院等人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特务活动的重要场所。旧社会特业经营者，本人若有权有势，他人不敢刁难。否则必须依靠权势做后台、顶门棍方能维持。宪兵就是当时地方上有权势的了，因此宪兵要求特业者给以职业上的掩护，那是特业者一呼百诺，求之不得的事，利用特业本身容易搜集各种情报及思想言论为宪兵效劳。如此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不知多少中华儿女、爱国志士，在“反满抗日分子”、“战时危险分子”的罪名下被屠杀，多少无辜百姓，在“国事

犯”、“思想犯”、“经济犯”的罪名下，被逮捕送进“思想矫正辅导院”，沉重劳役，不堪其苦，折磨致死后扔进万人坑。

1944年9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其所谓“大东亚圣战完遂”，意为“扩大的侵略战争最后胜利”，在鞍山宪兵分队的基础上，改组扩大为“鞍山宪兵分团”隶属奉天第一宪兵团。1945年光复前，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作最后的挣扎，变本加厉地对中国人民施以高压手段，又在鞍山宪兵分团的基础上，扩大为“鞍山第十四宪兵团”。刚刚成立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无条件投降了。

（摘自《鞍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的罪恶活动

张涉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镇压矿工中的反满抗日活动，1943年11月，由锦州日本宪兵队派遣，建立了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也叫分遣队）。该队由锦州日本宪兵队本部直接领导，到1945年4月撤离北票，并入阜新宪兵分队。

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有队长1人，为上士山本正夫；副队长1人，为中士浦本俊夫；有日籍宪兵准士山口××、太田××、××义藤、××齐藤等，并先后用翻译6名，特务、密探、“狗腿子”三十多名，杂役1人。初期所用翻译为胡庆余、刘仁亮、吕宝兴、吕宝善、张××、曹忠山。翻译有明确分工：曹忠山负责外勤；刘仁亮负责内勤、文件翻译和审讯时口头翻译；胡

庆余、吕宝兴、吕宝善每天分别到北票邮政局、电报局负责检查和翻译信件、电报。派遣队设在冠山采炭所第一公馆。

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主要在北票炭矿活动，与北票邮政局、电报局、炭矿劳务系、警务系、吐默特中旗旗公署警务科、火车站、协和会等均有联系，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情报汇集网。其主要任务是：在炭矿工人中搜捕地下共产党员和破获八路军的活动（宪兵队办公室内挂有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图）；侦察矿工中的反满抗日分子；监视“特殊工人”的异常动向，以及所谓的各种犯罪行为。宪兵队内设有审讯室和各种刑具。

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成立的两年间，广大矿工身受其害，有的被拘捕、审讯、严刑拷打，致伤致残，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投入监狱，被残害者无法统计。

宪兵队搜集情报和镇压矿工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在各部门设立秘密工作人员。这些人员经常出没在工村、独身寮、警察派出所、劳务系分所、包工大柜，了解工人的思想情况。利用各单位的日本籍工作人员，掌握中国工作人员的思想动向，凡是他们认为有问题的重点对象，用卡片登记立案。

二、每天派固定人员到邮政局、电报局检查来往信件和电报。开始去的是翻译胡庆余，后来是吕宝兴。通常是一名翻译和两名宪兵一同去。检查的重点是唐山和华北地区的来往信件和电报。每天要检查10件到20件，由翻译将信件内容用书面译出或口头翻译，交给日本宪兵，认为可疑的信件、电报即收起登记。当时引起宪兵注意的人有炭矿的雇员陈宽修（燕京大学毕业）、小学教员龚瑾（女）、工人于××、李××等，这是一个时期列为重点检查的人物。

三、利用犯人和被捕人员做反间工作。经特务张福民证实：

“我是1944年被释放出狱，由锦州宪兵队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长山本正夫，将我带到北票做反间工作的”。山本正夫托北票协和会事务长山本若太郎，将张福民介绍到北票炭矿株式会社劳务科当雇员，月薪110元。名义上是在劳务课工作，实际上是宪兵队派到劳务课的特务。他积极效忠日本侵略者，曾调查过采用系雇员陈宽修、劳务课雇员王义生、阎桐瑞等3人的情况，认为他们思想可疑，写报告给山本正夫。因此，这3人都被审讯和遭迫害。

四、检查事故。每当炭矿发生事故时，警务系就及时向宪兵队报告。宪兵队就前往出事故地点进行调查，并对有关人员审讯，每次都有很多人遭到毒打，逼他们供认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搞的破坏，有的人因此被投进监狱。

五、宪兵队和炭矿的警务系、劳务系、协和会与当地伪政权、车站、邮电局等有秘密联系。这些部门经常将可疑人员向宪兵队报告。宪兵队长山本正夫经常到旗长沁布多尔济、街长马连登家密商和了解情况，有时他也装成协和会员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思想的动向，以及交出荷粮的情况。

六、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到工村、旅店，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可疑人员。每次都拘捕很多人，一些无辜群众遭受严刑拷打，有的被逼自杀，造成家破人亡。

1943年底，根据情报，宪兵队翻译刘仁亮指使其狗腿子李××、曹××拿着他的名片，到北票十八亩村杜清林家搜出5支大枪，并将杜押送到伪警察署，后送到阜新被处死。杜妻被逼受惊吓得病，不久而亡。

1944年入冬，刘德臣被定为反满抗日分子被抓到宪兵队。宪兵队副队长浦本和翻译吕宝兴对刘审讯，刘不招认又受电刑，最后还把刘的衣服扒光，向他身上泼水，推出门外站着“冻冰

棒”，以致终身残废。

宪兵队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嫌疑分子的迫害更为残酷。台吉采炭所工人刘喜孔，就是以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抓到宪兵队的。特务和狗腿子对刘轮番吊打审问、过电，最后将刘押送到锦州日本宪兵队，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因而受到表彰和奖励。北票街内“双兴铁匠炉”的几个工人，被宪兵队以私通八路军的罪名，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投进监狱。

对暴动逃跑而被宪兵队抓回的一些“特殊工人”，十有九个被打死，有的被判刑入狱，成为死囚。更可恶的是那些宪兵队的翻译、特务、狗腿子，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豢养和怂恿下，狗仗人势，对人民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解放后虽有的被处死、判刑，尚不能解人民心头之恨！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

伪满孙吴宪兵队

王登明

一、历史沿革

日本宪兵队是日本侵略者对被奴役的中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的权力机构与指挥机关。自1931年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成立后，统辖伪满各地所有的宪兵队（本部）、分队、分遣队（或派遣队），并从日本、朝鲜增调一批宪兵加强沈阳、长春、哈尔滨宪兵队。1933年成立承德宪兵队，1934年日寇为实行所谓“治安肃正”，继续从日本增设大批宪兵，配置于各地宪兵队和

日军“讨伐队”内，向我抗联活动根据地疯狂进攻。日寇为了镇压抗联和其他爱国活动，加强了各宪兵管辖区域，大量地增设宪兵队本部，自1936年至1938年曾先后设立了大连、牡丹江、安东、佳木斯、海拉尔等宪兵队。孙吴宪兵队就是在这个期间“应运”而生的。

孙吴宪兵队成立于1937年8月，队本部设在孙吴。由日军中佐和昌田雄首任队长，日军少尉内海米十郎任课长，日军中尉田附常邻任副官。日军中佐辛川加寿夫、谷川岩吉、松永亲弘先后接任队长。孙吴宪兵队直接受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统辖。其任务主要是侦察苏联情报人员，镇压抗日联军和其他抗日活动。孙吴宪兵队本部的名称及其管辖范围几经变化，成立当时辖孙吴、北安、黑河3个宪兵分队及绥化、奇克分遣队、瑗琿分驻所。1938年本部迁至北安，改称“北安宪兵队”，孙吴宪兵队本部缩为孙吴宪兵分队，受北安宪兵队管辖。同时，在孙吴县之霍尔滨津设胜武屯分遣队，将瑗琿宪兵分驻所扩大为宪兵分遣队。1939年设龙镇、神武屯、嫩江宪兵分遣队，撤销胜武屯分遣队。1941年4月设泰安宪兵分驻所，是年7月，本部再次迁往孙吴，又改称孙吴宪兵队。1942年4月撤销泰安宪兵分驻所，是年8月，嫩江宪兵分队编入孙吴宪兵队。1943年4月设纳金口子宪兵派遣队。1944年6月，在瑗琿县源利金厂设立源利派遣队，嫩江分队缩编为分遣队，绥化、龙镇、奇克、瑗琿、神武屯分遣队变为派遣队。1945年3月各派遣队撤销，7月15日撤销孙吴宪兵队，将孙吴宪兵队本部及下设的分队、派遣队分别编入哈尔滨、齐齐哈尔宪兵队。

孙吴宪兵队的组织演变按年代排列如下：

1937年8月：孙吴宪兵本部辖克山分遣队、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孙吴分队、黑河分队、黑河分队瑗琿分驻

所。

1938年：北安宪兵队本部直辖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孙吴分队神武屯分遣队、黑河分队、黑河分队瑗琿分遣队。

1939年8月：北安宪兵队本部、直辖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黑河分队、黑河分队瑗琿分遣队、黑河分队神武屯分遣队、本部直辖嫩江分遣队。

1940年8月：北安宪兵队本部直辖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山神府分队、山神府分队瑗琿分遣队、山神府分队神武屯分遣队、黑河分队。

1941年：孙吴宪兵队本部辖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北安分队泰安分驻所、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山神府分队、山神府分队瑗琿分遣队、山神府分队神武屯分遣队、黑河分队。

1942年：孙吴宪兵队本部辖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北安分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黑河分队、山神府分队、山神府分队神武屯分遣队、嫩江分队。

1943年8月：孙吴宪兵队本部辖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山神府分队、山神府分队瑗琿分遣队、山神府分队神武屯分遣队、山神府分队纳金口子派遣队、黑河分队、嫩江分队。

1944年1月：孙吴宪兵队本部辖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派遣队、黑河分队、黑河分队瑗琿分遣队、黑河分队神武屯派遣队、山神府分队、山神府分队嫩江分遣队、山神府分队、纳金口子

派遣队、山神府分队源利派遣队。

1945年3月：撤销源利神武屯、龙镇派遣队，同年6月1日撤销纳金口子派遣队，同年8月撤销孙吴宪兵队本部，同时撤销黑河、山神府分队、奇克派遣队、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派遣队、孙吴分队、孙吴分队瑗琿派遣队，划归哈尔滨宪兵队本部。嫩江分队划归齐齐哈尔宪兵队本部。

二、机构和职责

孙吴日本宪兵队：内部设有队长室、副官室、庶务室、经理室、特高课、警务室、特高工作班、厩舍、车库等。

队长根据新京关东宪兵司令官的命令，领导本部及所管辖的分队工作，将本部及分队、分遣队情况综合汇报新京司令部。

副官根据本部队长指令，领导庶务室、经理室和医务室的工作。

庶务室根据本部副官的指示直接掌握本部及各分队的人事调动，马匹、车辆分配，内外文件发送，队员考勤，武器保管及各种队务工作。

经理室掌握全队所管辖内的财经工作，并以副官指令发放本部及各分队宪兵的工资、被服、管理备品和队员的福利工作。

医务室分军医与兽医两部分，军医根据孙吴陆军医院的指令，按期在宪兵内作身体检查，预防注射等工作；兽医根据孙吴第四军管区兽医部的指示，保护孙吴宪兵队所管辖的各分队的军马。

特高课长兼任警务课长，他站在特高课长的地位，根据本部队长指令，领导特高课宪兵，进行谍报工作，并经常给各分队的特高室主任指出重点工作方向和工作办法，站在警务课长地位，管辖各分队的警务工作，并负维持各地区驻军的军风纪，

保护军用物资等责。孙吴宪兵队的特高工作班，即是本部里的外勤便衣特务，特高工作班在本部特高课长和特高主任直接领导下，专对各分队发现的外国间谍进行审讯、利诱、逆用等工作。

宪兵分队：各分队设队长一名，一般以尉级军官充当。下设特高班、警务班、庶务班。特高工作班是本分队管辖区域内穿着便衣的外勤特务，是专门寻找、搜捕所谓反满抗日人员的秘密组织。警务班专负军事警察任务，保护军用物资和军事工程，维护各地军警的军风纪等。必要时也武装出动，参加“围剿”抗日联军及搜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由于黑河宪兵分队比较重要，1937年以陆军少佐沈山三郎充任队长，并设有科学室和邮检班。邮检班即是宪兵分队派下士官数名常驻保安局邮检班和电话局内，专门从事检查信件和偷听电话等等。

分遣队（或派遣队）：均设队长，下设特高系、警务系、战务系、庶务系，其各系职责大体与分队相同。

宪兵诘所：伪满孙吴宪兵队曾在黑河火车站、孙吴火车站、黑河江边设3个宪兵诘所。其任务一是为了维持日军上下车的秩序；二是对上下车的中国旅客进行检查，尤其对旅行证明和居住证明的检查十分严格，从中发现苏联情报员及抗日地下工作者。

宪兵诘所还派“密算查证”宪兵（伍长）跟随火车检查每名旅客证件。当时每天10点钟，由黑河站发往哈尔滨的304次列车上，都有1名宪兵伍长到列车上领导铁路警察工作，他们专门检查中国乘客证件，核对每个证件的暗号与密码是否相符。到达北安后，向宪兵队汇报途中工作，翌日晨8时乘303次返回黑河时，对本次列车乘客再行检查。黑河江边诘所是临时性诘所，其主要任务是对来往的轮船、帆船、木排上的人员进行检查。船

只到达黑河河岸时，宪兵一定到江边查证。船只开发时，宪兵要按时到达江边给乘客证明书签字。它的目的与火车站诊所相同，借此限制国境地带居民活动，防止“坏人”潜入，搜捕抗日人士及镇压抗日爱国活动。

宪兵：即是日本的军事警察，经宪兵教事队训练6个月，出校后任宪兵职责，他们皆有较丰富的军事警察知识，负有维持军队的军风纪、保护军事行动的机密防谍工作。

宪补：是宪兵的补助者，本身没有司法权，一切都是辅助性工作，待遇上比宪兵低得多。但是在宪兵队特高组织里，特务外勤工作方面，仍然站在最重要地位，担负很大责任。

日本宪兵队所以要采用宪补，原因在于他依靠密侦进行工作，而密侦是中国人。日本宪兵直接对中国人密侦，不明白语言，不便其工作，于是他们采取招考宪补的办法，挑选那些通晓日语和日本人风俗习惯的人，入宪兵学校学习特务工作3个月后，辅助宪兵工作。为了特殊需要，日本宪兵队不但采用中国人宪补，还采用白俄宪补与蒙古族宪补。此外，还在朝鲜人中招考宪兵补。因为敌伪时期，朝鲜人地位在中国人之上，所以叫宪兵补，同宪兵一样分为几等宪兵补。

密侦：是宪兵队利用威逼恫吓，金钱利诱等手段收买的外围工作人员，有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也有中国籍的苏联人。他们专为日本宪兵提供情报，是日本宪兵的腿子和耳目。

日本宪兵在伪黑河省发展密侦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使密侦充斥伪黑河各地机关、学校、会社、商店、工厂、农村、仓库、码头、车站、旅店、饭馆、茶房、妓院、赌局等各个角落，不但数量惊人，行业也是五花八门，甚至在外商及外国领事馆中也发展密侦。一般分为职业密侦、游动密侦、固定密侦、刑事密侦与特务高等密侦。

伪满孙吴中国人中工人、农民、商人占绝大部分，孙吴宪兵队特高课针对这一特点，一是在工房子里选择许多青年、流氓无赖加以利诱，充当密侦，在工人中搜集情况；二是在小店的管栈人及司帐先生中发展密侦，让他们在住宿人中发现“可疑”的人；三是为搜捕苏联地下情报员及抗日地下工作者在孙吴街外及曾家堡一带散住孤居的农民中发展密侦；四是当时孙吴街妓馆很多，去妓馆的工人很容易在妓女面前吐出真情，暴露身份。所以孙吴宪兵队大量在妓女中发展密侦，让她们听取住宿人的可疑言论。

伪满孙吴宪兵队特高课除在其管辖区域内极力发展密侦，还将密侦派往海伦、绥化、泰安、克山、拜泉等地搜集情报。

三、罪行累累

孙吴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伪黑河省人民实行法西斯反动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与日本关东军情报部黑河支部——黑河特务机关、警察队、满洲宪兵团、协和会等军警特务机构一样，配合日本统治集团每个时期的殖民统治方针，进行着最反动、最阴险、最残酷的反动特务活动。它站在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最前线，施以德国希特勒“盖世太保”特务组织的逮捕、屠杀、绑架、电刑、拷打、逼供、利诱等等野蛮、恐怖、惨无人道的手段，疯狂地“围剿”抗日联军，惨杀苏联地下工作人员，抗日地下工作者，爱国人士及无辜群众，是伪黑河省人民最毒辣、最凶残的敌人。

1. 逮捕惨杀苏联情报员及抗日地下工作者

针对伪黑河省是国境地带、面对苏联的特点，孙吴日本宪兵队及其所属各分队、分遣队在伪黑河省地带活动重点，是以各种办法对付苏联情报员及我抗日地下工作者：他们除大量发

展密侦建立情报网，成立邮检班，检查信件，偷听电话，收听电波，设立诘所，实行密码查证之外，并实行夜间守候及间道对策。所谓间道对策即是宪兵和宪补共同携带武器和食品，专走山间小道，发现路上行人当场讯问，并检查其携带物品和证件，从中发现“可疑的人”。有时，他们到江船上去搜捕检查，被逮捕的苏联情报员及我抗日地下工作者受到严刑拷打后，大部送到731细菌部队当作“木头”惨杀，少数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被送到黑河特务机关训练后，作逆用工作。

1939年10月至1940年11月间，北安宪兵分队长田附常郅中尉及武下虎市大尉司令部下宫崎信伍长在北黑线列车上实行“密算查证”时，将3名苏联情报员（中国人）逮捕，拷打刑讯后送731细菌部队杀害。1941年3月，苏联情报员赵殿卿在北黑线303次列车上，被密算查证宪兵发现证明书不符，孙吴宪兵队和昌田雄中佐命部下瀝美清少尉带翻译奥田胜及中国人宪补杨××、赵××由龙镇乘车跟踪赵殿卿，在通北站被瀝美清一伙逮捕，搜取手枪一支。日本宪兵用竹剑殴打赵的头部及手脚，后送731细菌部队杀害。1940年6月，孙吴宪兵分队密算查证宪兵逮捕苏联情报员刘某（中国人），经刑讯后，送石井（731）细菌部队惨杀。1944年9月，黑河火车站宪兵诘所奉黑河宪兵分队长羽腾宽（中尉）之命，在检查证明书中，逮捕了苏联情报员王福山，经威逼利诱后，转送黑河特务机关。

1939年7月，孙吴宪兵分队长毛利率三大尉司令部下板口直藏曹长等3名宪兵将在孙吴曾家堡农民住宅中休息的1名苏联情报员（中国人、约30岁左右）逮捕、刑讯后送731细菌部队惨杀。1941年末，琿琿宪兵分遣队沼口助伍长在“间道对策”中逮捕1人，送731细菌部队杀害。

孙吴宪兵队自1939年10月至1943年11月和1944年5月

末至1944年12月末，在先后四年半的时间里，在队长和田昌雄、谷川岩吉、松永亲弘中佐指挥下，以逮捕、惨杀苏联情报员及我抗日地下工作者为主要任务，共计逮捕40余名。其中，在北黑线列车、车站实行密算查证时，黑河宪兵分队逮捕约13名，孙吴宪兵分队逮捕约5名，北安宪兵分队逮捕约6名。在黑龙江岸夜间守候、巡逻及间道盘查中，黑河宪兵分队在黑河街、五道壑洛附近逮捕3名，在长发屯、牡丹江附近逮捕8名。孙吴宪兵分队逮捕约4名，山神府宪兵分队逮捕2名。大部送731细菌部队杀害。

2. 绑架、杀害中国无辜群众

1944年10月，第四军道路部配属宪兵岛崎威浪军曹以下3人在北黑线列车上，强迫1名中国旅客从途中辰清下车，抢夺其金钱后带到山林中打死。

1945年2月，神武屯日本陆军医院因丢失一支注射器，将情况报告宪兵派遣队长沼口曹长。沼口带军曹西尾昭信及宪补马××来到医院，当时医院只有1名打扫烟筒的中国工人，便把他抓来审问，用竹刀、木刀乱砍他的背部、四脚，在严冬里让他裸体到屋外站立3次，每次10分钟。又用火钩烧他的鼻尖、胸部，刑讯4天致死。

1941年6月，瑷琿县骆驼脖子杜连奎、五里亚屯陈子延、金山排子李富友等均被日本宪兵打死。此外，在源利金厂日宪逮捕工人14名……

1945年5月，奇克宪兵派遣队队长笹岛松夫（准尉），据密侦报告：奇克西南约六七公里山麓中某村庄两名中国居民（40岁左右，名不详）贩卖的鸦片来路不明，有抗日地下情报员之嫌，遂命令部下大江忠逸军曹及金田翻译（朝鲜人）把他俩捕来，用电刑、老虎凳将他们杀害后，为消灭罪证在夜间用马车

把尸体拉到奇克南山中国人坟地掩埋，并让县公署伪造心脏病死亡的死亡证明书，掩盖其杀人罪行。

1945年8月12日，有8名打桦子的中国居民（其中妇女1名）在北孙吴三里丁南侧，顺逊别拉河堤坝向瑗琿方向行走，被在孙吴临时编成的宪兵中队逮捕监禁。8月14日苏军逼近北孙吴，当日午后2时许，宪兵中队长羽藤宽命令部下放火烧房，并投掷手榴弹，同时将这8名中国居民无辜烧死。为掩盖杀人罪行，羽藤宽中尉命西尾昭信以下18名宪兵将尸体埋藏于宪兵分队横壕内。

诸如以上擅杀中国无辜群众的罪行不胜枚举。仅据1939年任孙吴宪兵队庶务军曹，1944年6月任孙吴宪兵队庶务主任，瑗琿分遣队长、奇克派遣队长的笹岛松夫一人供称：在六七年中他指挥部下或亲自杀人3名，参加集体杀人3名，帮助杀人54名。又据曾担任孙吴宪兵队曹长的西尾昭信供称：他亲自杀人4名，帮助杀人10名，参加杀人71名。4年中共殴打中国人621名。

3. 残酷的奴役、屠杀中国劳工

日本侵略者在伪黑河省统治时期，曾在孙吴驻扎一个师团，大约5万名左右关东军，在瑗琿县驻扎1个旅团，大约两万人左右。他们为了长期统治下去及为进攻苏联做准备，曾从关内及东北各地骗招几万名中国劳工，为他们修筑了许多山洞、兵营、桥梁、飞机场、军事公路等等。（胜）武屯分遣队、纳金口子派遣队、源利派遣队都是为了保护这些军事工程而建立的。中国劳工在宪兵、把头的驱赶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着非人的折磨：严冬住的是席棚子，披麻袋片、洋灰袋子，每天吃不饱肚子，干十几个小时重活，日本监工、宪兵拿着镐把，连踢带打。逃跑了抓回来，有的被枪毙，有的被活埋，有的冬天被剥

光衣服绕圈跑。跑不动，日本宪兵用棒子打，浇凉水，吊起来用铁丝鞭子抽，有的被割去耳朵、鼻子。夏天，有的被剥光衣服活活叫蚊子咬死，打死、病死、饿死不计其数，修完山洞的大部分工人均被集体枪杀和毒死。

1935年（康德2年）在大连被日本福昌公司招到孙吴修路和大营的劳工有三千多人，每天劳动19小时，不到1年死了六七百人。

1936年（康德3年）2月天津日本租界大东公司在天津招工一千一百多人，在沈阳招六百多人，这些人被骗到瑗珲县西岗子给日本岩崎部队修山洞，张贵芳、宋长科、张希云、韩长林、张德兴、卢青山、袁玉奎等人均被活活打死。修完山洞后，这些人大部被日寇枪杀。从北安抓来一千三百多名劳工，完工时只剩七百余名，也都被日寇集体屠杀。

1937年（康德4年）1月修孙吴平顶树机场的劳工二百多人被日军枪杀4名，用马拖死2名，1名赶大车的因没给日本人行礼，被活活打死。后来劳工增至2000人，仅河边死尸就堆着三百多人。

1938年（康德5年）在额尼河修路的劳工三百多人，最后只剩三十多人。

1939年（康德6年）在山神府、双峡一带修军事公路的中国劳工冻死、饿死的就有300余人。修桦子沟山洞的五百多劳工全部被屠杀。被日军104部队从哈尔滨招到孙吴的一千五百多劳工，饿死冻死七百多人。

1942年（康德9年）在纳金口子给日寇修路的中国劳工有二千多人，不到1年就死了一千多人。这年，修孙吴北大桥有三千多人，死亡一千多人。

1943年（康德10年）春修山神府飞机场，由关内招来一千

六七百劳工，七八个月间，被打死、饿死的就有七八百人。同年春从山东曹州府招来二百多劳工修山神府山洞，修完后得以活命的有四十多人，其余全被毒死。

1943年（康德10年）11月中旬，霍龙门至黑河铁路线冷川站南山林内，有日军第四军道路部，即第七一八部队看押100余名从华北俘虏的国民党兵士为其修路，道路部长小山中佐命令渡边伍长用日本军刀砍杀3名所谓“思想不良”分子。1943年6月至1944年9月，该道路部以“勤劳奉公队”、“勤劳报国队”名义在各地拉来3600余名中国人，日本宪兵对他们严加监视、强制劳役。由于劳累过度，挨打受冻，疾病流行，1年内死亡400余人。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从我的经历看日本 铁岭宪兵队的罪行

范宪章

我是在1943年参加日本宪兵队工作的，曾作过密侦翻译等工作，约两年多。

1943年正值敌人进行所谓大东亚战争正酣时期（实际是面临灭亡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东北三省靠苏联边境修建防卫工事。在中满地带修军事仓库，为的是生产或储存大量军火物资，企图用来支援太平洋战场，以挽救其失利。乱石山军事现场（驻敌七二七部队），就是这种仓库之一。

在距离辽宁省铁岭县南乱石山车站2.5公里的东部有一处

山地，地形是群山环绕，中间为盆地，纵横方圆10公里，共由8个村庄组成，名叫八大密下甸子。日本勘探队勘察后，日伪当局便下令驱逐所有农民，没收地产，在此地着手修建一个规模庞大的空军秘密军火仓库。当时，把整个山用人工削去一半后，以铁筋钢骨水泥筑成圆形大罐。每罐可储存汽油几万吨。罐筑成后，仍然用土培好，山上栽些花草树木，伪装隐蔽。另外建筑约有10栋地面仓库，间距50米左右，以防止被轰炸后接连燃烧、爆炸，房脊上伪造烟筒，好象农民住宅一样骗人眼目。总计这类设施大小约二百多处，能容存大量军火、炸弹、汽油、军械等。

修建这样庞大的军事设施，除必需的技术工人外，还需要几千名中国劳动人民来做义务工。所以由东北各地强征劳工数千名。为了防止工程遭到破坏，或有煽动罢工影响工程进展的事件发生，特由铁岭宪兵队派驻一个宪兵纠查所，来保卫这个大工地的治安。

铁岭宪兵队特高系，由日本宪兵军曹（中士）担当总的工作，后来由浜田曹长（宪兵上士）负责，组成所谓防谍队。日系宪兵共5名，下有中国宪兵补3名；李庚年、查活国和韩××。还有密侦6名；李向阳、周维政、毛朋学、何文阁、李永士、范宪章（即作者本人）。下设联络员几名，他们以不同的身份混入工人群众中，搜集有关煽动罢工、破坏生产、集会等活动情报。

我初期混入国际运输公司装卸工人队里，以联络员身份进行活动。

(1) 搜集工人之间，谁和谁相处密切（防止集体反满活动）。

(2) 侧面了解，利用其他人了解工人的文化程度（从中调查知识分子）或多数工人拥护的人。

(3) 了解工人中出身知识分子的，曾为工人争利，打抱不平，带头要工资讲待遇的分子。

(4) 查询工人登记年龄、语言特征，及通信关系。

(5) 了解从关内来东北的工人，或者由热河省地区来做工的。

其他不属上面五项，需要进行的侦查活动还很多。总是怕工人反抗，怕工人秘密集会，搞集体暴动，怕工人向关内通反，泄漏秘密。怕工人当中混入共产党员做地下工作。

我在该队工作不到半年，身份暴露后，我没法继续进行秘密侦查工作，奉命又转为公开活动。

(1) 检查工人来往信件，常到邮局抽查，对象是由关内来的信，去关内的信，定期寄往他地信件。

(2) 登记上述收发信人姓名、原籍及通信内容有无其他蓄谋活动，检查信一般是用水调开信封口，必要时将信交给上级用科学方法鉴定。

(3) 监视工人金钱使用情况，从中查找工人收入和花销对比，了解其钱的来源。谁和谁在一起吃喝，搞什么勾当，哪个工人在群众中有威信，和工人平时阅读书籍的情况。

(4) 通过村中伪保长、组长了解在军事现场附近的居民迁移情况，确定是否抱有什么目的迁来或迁出。工人下班后，到村中与哪家常来常往，发生什么关系。

(5) 来军事现场附近各农村的游贩或者不常来的客，都列为可疑分子对象，有时秘密跟踪，有时公开盘查。

再谈谈伪宪兵队人员的罪恶：

伪宪兵队走狗发现上述情况，有一点苗头就利用职权恫吓，敲诈勒索。1943年5月，住在乱石山车站附近的杨洪图，1943年5月，他妻姪在山东无法谋生，来东北找出路。因此地是军管

地区，不允许陌生人久留。所以杨洪图晚间招待他妻侄吃一顿饱饭，次日趁天没明送走，怕在车站被发现，送到距离7.5公里的新台子车站上火车。腰堡村的屯长、联络员赵风顺（也是情报员）知道了这一消息，便借机讹诈杨洪图说：“你的妻姪大概是关里来的探子，为什么来住半晚上就走了呢？”杨洪图百般哀求，发誓说妻侄绝非“探子”。赵风顺始终不听，并且说你把这个人找回来，交给宪兵队审问明白才行，否则你就是隐藏间谍，不但你生命有危险，就连我们知情不报也要受到处分。杨洪图只好以烟酒招待赵风顺，又送给他伪满币100元。赵临走时又说：“事情以后不定还闹到什么地步，我尽力帮助你，如果上边知道，你还得认人要人不要钱。”俗语说：钱能买罪。他走了之后，杨洪图想虽然用金钱一时贿赂住了赵，但心中仍然害怕，和老婆合计想全家逃走。但拖家带口也不好逃走，最后只好杨洪图自己先走。杨洪图在铁岭住了4天，后来遇着同屯子的人说，他家平安无事，这才冒着生命危险晚间偷偷回家。杨洪图为什么叫赵风顺弄得全家不宁呢？原来他几次向杨洪图借钱借米，都被杨洪图拒绝了，他怀恨在心，处心积虑想办法找杨的毛病，终于因杨家来客人一事，达到他想敲诈恐吓的目的。

日本宪兵队在敦化的血腥暴行

吴白岩

“九·一八”事变后，驻敦化的旧东北军“老三营”王德林部愤然举义，组织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城西半截河屯的陈翰章，城东沙河镇的戴凤龄（当过民团保董），以及许多地方爱国青年

都先后加入了救国军。1932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五）王德林率部攻入敦化县城时，人民怀着收复失地的心情，欢迎和爱戴这支抗日的队伍。及至王部退走，日军又卷土重来之后，人民正提心吊胆的时候，祸事就发生了。

日本宪兵队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张敦化士绅供给义勇军物资的单据。敌寇据此便认定是勾结救国军反满抗日，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就按单据一连串逮捕了12个人。其中有：万茂森（字荫卿，敦化商会会长，曾当过省议会议员）、谭宗周（字质轩，敦化农务会会长）、于登瀛（磐石县人，敦化税捐局局长，曾当过省议会议员）、盖文华（敦化、蛟河两县国民党总负责人，时任蛟河小学校校长）、杨振邦（吉敦铁路敦化站电务员）、王洛市（字兆图，办垦务者）、王虎子（在县城十字街开饭店）其余人姓名记不得了。

日本宪兵队在敦化严刑拷打初步审讯之后，又把他们送到吉林省城，不断地进行严刑审讯。因为他们没有株连别人，也没有道出救国军的情况，所以把他们押在宪兵队二层楼上。后来，在一个漆黑的夜间，谭宗周和王洛市，不顾一切，缒楼而下逃出了虎口，他们也投到救国军中去了。

第二日黎明，日本宪兵队发现逃走了两人，马上把其余的人装上盖着篷布的大汽车，把每人眼睛用白布扎紧，开到吉林省城北山下九龙口刑场，用钝刀锯断了他们的咽喉，脖后颈也不拉断，还留一段仍与身体联系着，一时呼叫之声惨不忍闻，附近住户都听到了。事后收尸，雇叫花子在死者喉头都缝了三针，又把每个死者的头和后颈连缀在一起。当时看见万茂森的眼珠子都冒出来了，其余的死者也都体无完肤，令人目不忍睹。

当英国李顿爵士率领国联调查团前来我国东北调查时。刚在上海登陆，即有吉省士绅以吉林同乡会名义据状控诉，把这

一案的全部经过情形，交给了国联调查团。控诉书中仍然是按着最初逮捕 12 个人的名字提出的。以后有人见到这部分材料底稿，据说是由吉林同乡胡体乾执笔的。

日伪宪特在宁安、吉林市 等地的罪行五例

赵卜谦

“九·一八”后，日军肆意横行到处侵占掠夺，惟在旧吉林省中部的宁安县（今属黑龙江省）周边受过重创，尤其是在县属镜泊湖附近。因宁安南邻汪清，北接方正，山环水抱，形势险要。加之，一度曾以方正为据点的李杜、冯占海等和以汪清为据点的王德林等所部的抗日军，同宁安地方武装保卫队长刘万魁等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都须通过宁安进行联系。所以日军侵入宁安，并不是“无血入城”的。

日军记恨于宁安地方武装力量结合正规军队对其的抵抗，回忆起历史的旧忿，入城后除大索与“中村事件”有关的原籍宁安、屯垦军团长关玉衡家属、亲戚们，捉到关团长的弟弟填塞“冰眼”外，还唆使凶残的宪特们捕风捉影地加害人民。现将我所知道的宪特们的罪行事例，概述如下：

（一）孙麟绶，字锦书，吉林农业学校毕业。“九·一八”前曾任宁安县教育会评议员和东京城镇第一小学校长等职多年。他的叔父孙思涛是由延吉道区八县选出的北洋政府时期众议院议员。他家住在东京城镇附近的“穆齐”，他们叔侄在地方上是比较有声誉的人。“九·一八”后，日伪利用他的声誉，叫他担

当伪东京镇协和支会的负责人。他把伪协和支会成立起来了，并网罗了一些伪协和会员。有一天突然特务把他逮捕了，并搜去他家的金银财物。事后打听说他征收的伪协和会费没有缴予“上级”，私结集团，有不稳的行动。关押在日本宪兵分队后，非刑严讯，未得供词。特务们威逼欺骗，他家花了多少次的冤枉钱，把家当也花光了。后来说案情重大，一再转移地方，最后把他关押在铁岭河日本国防军司令部所属的宪兵队里，严刑逼供，筋断骨折，死于刑下。

(二) 张志铭是宁安县东京镇人，毕业于北京师大，历任宁安劝学所长、教育局长等职。他的叔父张肇祥是毓顺机制面粉公司经理，该公司设在距宁安30公里的中东铁路海林站，当时驻绥芬河（中东路东部线国境）的张宗昌部下某旅长与张肇祥相处甚密，后来该旅长移驻山东省济南，张志铭经其叔介绍，曾一度为某旅部书记官。曾在北京读书时参加过反对修建海林站到镜泊湖之间轻便铁路，反对过日本公司在东京城镜泊湖之间买地，所以，日寇搜集曾与军界有关系的人，将张志铭抓去了。他被关押在宁安城一个当铺院内，每天受宪特的审讯，逼他坦白反日、排日的经过。他们用燃着的纸烟烧他脖子和喉头，人油滴滴往下淌，痛彻心髓。前痛未止，后痛又来，不许摆动，不能躲闪，今天烧烧，明天烧烧，把脖子烧成了斑斑豹豹，但是，还没有烧出特务们想要的东西来。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无罪释放。

(三) 刘法海是宁安县人，他父亲以开旅店为生。他少小时很聪明，最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该校是中东铁路公司在帝俄时创办的，采用俄人做教员，以俄语教授。学生们利用具备的条件，阅读进步的俄文书籍比较多一些。“九·一八”后该校的学生因思想、行动进步，被宪特逮捕的比任何学校的学生

都多。他是在毕业后被捕的。捕他的目的是因为他住在哈尔滨的时间较久，认识俄人较多，俄语的能力较强，想通过他检举些反满抗日的俄人、有破坏活动的俄人（如炸桥梁铁路、颠覆列车等等），及有进步思想、行动的中国学生。最初对他使用软的利诱手法，毫未奏效。接着改用硬的折磨手法。特务们竖起高有几丈的长梯，逼他上到顶端时，特务将梯拉倒，人随梯倒跌落地上，昏晕不省人事，特务们就用冷水将他喷醒后，逼他再上再跌，日有数次，跌得他头脑昏昏，虽还活着脑也不中用了。

（四）吉林救国会刘济瀛事件。1933年在吉林教育界曾发生一桩血腥的残暴事件。整个事件是由刘济瀛引起的。

1933年，我在吉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刘济瀛共同负会务责任。二人相处很好。我观察刘之言谈行动，已知其有所活动。后来他调转到永吉私立两级中学任教员。至1933年冬季，刘因在伪中国银行提取汇款，被日本宪兵查觉，幸而刘君机警得以脱险。但由此以后日伪对教育人员即加之以“思想匪”和“注意人”等等名号。1933年12月1日，第一师范学生李玉方被捕。12月3日，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被捕。12月5日，第一师范教务主任姜法壙被捕。女师教员肖伯孚、男师附小主任李禾村、西关第五小学校长魏复周、县两级中学教员张崇法，省一中训育主任丛绍章等，都先后被捕入狱。严刑迫害，后移至普通司法机关，先后释放。但不堪残暴死于严刑之下者有李光汉、姜法壙、李禾村和魏复周等人。

这一残酷事件，据我个人了解，除刘济瀛与在逃的郑璞、郑友三、刘墨卿确曾有组织救国会之活动，张崇法对刘亦有所帮助外，其他如李玉方是由仇人用救国会之黑信所陷害。各校之被害者是由日宪所认为的“注意人”，以严刑逼迫唆使被捕者虚

构诬陷任意株连所造成。而警宪所认为的“注意人”又与日系教员有关。在这里我举一事例以为印证。

1935年暑假开学后前一天，第一师日系教员土井健次，见教务主任住宿的房间很清洁宽敞，就将行李搬进住下。经姜法墙力争，土井理屈被迫搬出。从此以后我常见到土井对姜怒目而视。在姜被捕之同时，于半夜间有日宪士兵3名到一师将土井唤起偕同检查姜之卧室、办公桌。土井并为之燃炉取暖，对姜之书籍信件一直翻检到天明。由此可以推出姜之被捕与土井有关。

(五) 日本永田讨伐队对抗联之残暴。我有一宗弟孙法元，家住在吉林的敦化县。据他述说：敦化县的沙河沿，驻有日本警察讨伐队。伪满康德5年11月间，该队出外搜查沙河沿附近山沟内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某团相遇。当即开火战斗。因日军的武器人数占优势，结果抗联败退，朴团长被俘。抗联战士伤亡6人。凶恶残暴之日兵对此6人不论死活、伤之轻重，一律将头割下，把血淋淋的人头带回悬挂树上。他们以为借此以示威，殊不知这正是暴露他们的惨无人道狰狞之面目也。

伪满黑河省地方保安局

柴树功

伪黑河省地方保安局是伪满警察里的秘密机关，从事防谍、搜集情报等秘密活动。地方保安局除受所谓的中央保安局即满洲保安局领导外，还受当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指导、监督和控制。如捕获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谍报人员，必须送交日

本陆军特务机关，向苏、蒙派遣密探也必须向日本陆军机关呈请。满洲保安局则受日本关东军情报部（设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的掌握控制，只不过掩护在伪满的警察机构内。保安局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各国（主要是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本和伪满的谍报活动；向苏、蒙派遣间谍特务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掌管国境的警卫、国境地带的检查、治安管理以及其他警察业务。伪保安系统是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汉奸傀儡政权反共反人民的一支特务组织。为了加强控制，由伪治安部次长兼任保安局长官，伪警务司长兼任保安局次长。日本关东军还派有军官任保安局的参事官，代表关东军情报部长对保安局实行监督指挥，直接掌握对外派遣任务。地方保安局也在当地特务机关的监督指挥下工作。

伪中央保安局成立于1937年12月1日。1943年3月因伪国务院机构变革，治安部的警务司改称为警务总局，保安局受警务总局领导，警务总局长兼任保安局长官，警务总局特务处长兼任保安局次长。1945年7月，因伪中央保安局和警务总局业务重叠，中央保安局下设的一、二、四、五科与警务总局特务处的有关科合并，取消了保安局次长，由警务总局长兼任保安局长官，警务总局特务处长兼任保安局参事官。中央保安局下辖有地方保安局，掩护在各省警务厅内。各省警务厅长兼任地方保安局长，警务厅特务科长兼任保安局理事官。

1937年12月1日在伪中央保安局成立的同时，为了“强化国境地带”的防谍、情报活动，在当时的牡丹江、三江、黑河、热河、兴安北省和间岛（今吉林省延吉一带）等省成立了地方保安局。1938年4月成立了滨江省地方保安局，1939年成立了

东安、龙江、北安、锦州等省地方保安局。在所谓国境省地方保安局成立了由特务警察组成的“特谍班”，作为保安局从事秘密侦察活动的核心组织。1940年又成立了奉天、安东、通化、吉林、四平、兴安东省、兴安南省和伪首都地方保安局。这样，直至日伪垮台，伪满保安局下设了18个地方保安局。

伪黑河省地方保安局设于黑河，首任局长是当间音次郎，原为日本宪兵大尉，首任伪奉天市警务厅警务科长。他于1939年调任兴安南省任警务厅长，由竹内节雄继任。1941年竹内节雄调任伪新京（长春）警察副总监兼首都保安局局长，饭塚太郎为黑河地方保安局长。1942年9月至1944年5月，又由今川嘉尚接任。1944年5月后由正岡辉任伪黑河省警务厅长兼地方保安局长。黑河地方保安局设庶务、防谍、谍报、资料4个股。每股工作人员平均10人。又设总特谍班，下辖两个特谍班。有班长20人，班员80人左右。1942年在黑河、孙吴两地设防电班，其任务是监测可疑电波和潜伏电台。1940年设立邮检机构。伪黑河保安局在黑河街黑龙江岸设有秘密监狱，黑河街的日新饭店、恩记饭店、东洲饭店、萨哈亮饭店、阿穆尔饭店等都是秘密据点。黑河省保安局主要任务是：从黑龙江上游漠河地区向苏联派遣间谍，搜集军事、铁路、水上运输等情报；加强军事要害部门的防谍；江岸和交通要道的检查工作；镇压和逮捕我抗联和中国人民的反满抗日活动；诱买利用白俄，准备对苏战争时使用等。黑河省地方保安局下辖漠河、呼玛、鸥浦、乌云、逊克、孙吴、瑷琿7个县保安局。瑷琿保安局又称分室，下分一般特务、地下工作两部分。

伪黑河省及各县保安局基于人员状况：

正岡 辉 黑河警务厅长兼省地方保安局长，一等官。

吉丸鹿之助	理事官，黑河警务厅特务科长，二等官。
星亮三郎	事务官，三等官。
田中明昭	事务官，三等官。
增田俊吉	属官，会汉语。
相泽国雄	属官，会俄语。
罔胜 美	第一（庶务）股长，属官。
渡 边	第一股长，属官。
小林秀夫	第二（特务）股长。
提德 雄	第三（对苏谍报）股长。
田 烟	第四（兵要地志）股长。
中村福导	伪瑷琿县分室事务官兼警正。
寺尾格太郎	伪瑷琿县分室特务主任兼监督警尉，负责“地下工作”。
关山顺作	伪瑷琿县特务股特务主任兼警佐，负责一般特务。
中 岛	西岗子中队特务主任。
森 ×	孙吴特务股长，事务官兼警正。
边 川	孙吴特务分室主任兼警佐。
多胡幸司	逊克特务股长兼警佐。
美 山	逊克特务分室主任，监督警尉。
四 边	奇克特务主任，监督警尉。
忠江 忍	乌云特务股长，警佐。
增 山	呼玛特务股长，警佐。
须 田	呼玛特务分室主任，警尉。
田 中	鸥浦特务股长，警佐。
官 岛	漠河特务股长，警佐。

二

伪满洲保安局是在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大举向我国全面进攻时，为了对外进行情报、派遣、侦察、发现并破获各国情报活动，对内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反满爱国运动而成立的。所以，自始至终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当时的苏联、蒙古等为其工作的主要对象。1940年以前，主要是建立健全其特务组织时期，其活动主要还是依靠特务警察进行。1941年以后，由于德寇进攻苏联，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再加上保安局特务系统已完整化，因此，镇压国内爱国组织的活动和对苏情报都日益强化，更加残酷。1944年以后，由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每况愈下，接近灭亡，所以保安局的活动也达到疯狂的阶段。但是，无论在哪一时期，保安局的组织活动始终是绝对保密的。因此，全面揭露保安局的罪行是很困难的。本文就掌握的零碎材料，简谈一下保安局的罪行，难免挂一漏万。

（一）血腥镇压抗日联军等组织的爱国活动

1936年12月初，伪黑河省瑷琿县警务局司法股得到一份关于抗日联军领导者张某带有部下10余名来到黑河境内活动的情报。因此，警务局全力以赴进行大搜查。当时，警务局特务科特务股的中岛宗一带部下一人到瑷琿县兴安金厂搜捕。在搜查中，中岛宗一从该厂副经理（中国人，年约50岁）处了解到抗日武装领导者张某正在离兴安厂东北方约12公里的分厂内作砂金工人。于是，中岛宗一带领5人于拂晓时突然包围该厂工人宿舍，逮捕了张某。经过日特严刑逼拷，供出真实姓名张信。第二天带回黑河，经多田事务官严加拷打，又供出6人，其中1名是黑河某浴池的工人。张信与后被捕的6人于1937年4月间，被越智巡官指挥部下在西四家子附近用刺刀秘密杀害了。

1937年4、5月间，盐田警正所指挥的30名警察队袭击了抗日联军赵尚志所属的部队，杀害抗日军二十多人。逮捕了1名为抗联带路的鄂伦春人（男，约40岁左右）。在逊河城西北方约500米的地方，日军的一个曹长野蛮地用日本刀砍杀了他。而残无人道日特中岛宗一竟然把被害者的脑髓取出来烧黑了，与别人分着吃，企图用此来治自己的淋病。

1939年7月至12月，土屋警佐和斋藤平五郎警佐在瑗珲三站，利用特务收集抗联王明贵部活动的情报三十多件，送交警务厅处理。

1940年2月下旬至1943年2月间，仅瑗珲西岗子特务主任指使刘品一、徐英杰、郭岐山等人大肆收集情报。仅3年就搜得611件情报，其中有关抗日军的情报15件；有关宗教团体及反满抗日组织嫌疑的情报30件；“战时有害分子”动向的25件；居民对时局的思想动向约120件等等。这些情报，直接地镇压了抗日组织，逮捕和杀害抗日工作人员、和平居民，加强其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压迫和奴役。为了搜集情报，西岗子特务主任还奖励部下鸦片600片，以便进行情报活动。

1940年8月，为了进行据点清扫工作，逮捕抗日武装人员，保安局特务组织警察经常对山地的房屋进行调查或侦察，把无人的房屋破坏或者烧毁。仅三站和八车力河小队就烧毁、破坏房屋十多处。

1941年，接着保安局长官“镇压抗日人员计划”的指令，保安局编制了“防谍特殊名簿”，并且进行侦查，以便逮捕抗日人员，镇压抗日活动。当时编制特殊名簿的对象是：与苏联有关系的人；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反满抗日人员。根据情况制定对策：第一种立刻暗杀，第二种监禁，第三种追放。在这种法西斯政策驱使下，保安局经常以“嫌疑”为名任意抓人。如

1941年5、6月，就先后捕捉1名伐木工人和1名农民，经灌水、殴打、拷问，最后因无证据，监禁一段而释放。

（二）残酷压迫中国人民

1934年1月至同年4月间，从苏联回到中国的砂金工人有五百多人。为了探知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伪黑河国境警察队在芳林佐太郎的命令下把回来的砂金工人全部逮捕，进行审讯和拷打逼供，并且掠夺了他们砂金三十多公斤。

1940年2月至1943年2月间，为了镇压抗日活动，保安局根据伪“军机保护法”、“国境地带取缔法”，以“伪造居住证明书”、“伪造旅行许可书”为由，肆意盘查并逮捕中国和平居民350人，进行殴打。后将其中的七十多人提交哈尔滨、北安警护队，其余监禁一天至半个月后释放。

1940年3月至1943年2月间，仅保安局指挥西岗子、东岗子的警察就逮捕了由藤田组、大昌组、福高组、松本组、福昌公司、公信公司等修筑日军军事工地逃出来的劳工六十多名。日特用竹刀、鞭子殴打他们，将其中的二十多人给予所谓“逐出国境处分”，其余送至原工地服苦役。

每逢“五·一”劳动节、十月革命纪念日、年底年初，保安局特务便在村庄、工人宿舍、酒馆等地进行搜查盘问，以“行动可疑”为名大肆逮捕所谓“来路不明”的中国和平居民。仅1940年4月至1943年2月间，就抓了七十多人。

1940年5月至1942年10月左右，西岗子伪警察队管内有一千八百多名被抓来的劳工，为伪交通部土木工程所松木等单位服苦役。为了防止劳工逃跑，保证军事工程的修筑，保安局的特务配合日本宪兵对他们严加管理。如，限制他们活动地区，看管他们的宿舍等。劳工们卫生条件恶劣，饮食极差，患病不予治疗，病死了六十多人。有一百名逃跑的劳工被抓回，其中

五十多人被严刑拷问，把20人交给铁路警护队，追放到北安。其余押去继续服苦役。

1943年5月至同年9月，保安局主动与日军配合，监视看管在山神府东端修筑兵营、道路的劳工六百多人。因虐待而患病或者过度劳役而死亡的就有七十多人。

1943年2月至1944年5月，伪保安局协助日本宪兵队以“扫除国境地带”为名，逮捕所谓“无证明、无职业、无住址”和违犯伪满中央禁止采金禁令的砂金工人共计45人，结果把这45名工人送到伪鹤岗煤矿当劳工。

1943年5月至1944年8月间，在山神府伪警察管内有一万多中国和平居民被抓来为日军修公路、铁路、飞机场等。保安局特务配合日本宪兵队进行侦察，威胁村民不得给逃跑者吃饭住宿，要密告逃跑的人。结果，1943年8月抓住逃跑的和平居民7人，1944年6月抓住2人，7月逮捕逃跑的和平居民40多人。先后共抓52人，这些人都遭到残酷虐待。

此外，还有敲诈民财、逼交粮草、征用人力、车马、强奸民女等，不一一赘述。

（三）大肆收集苏联情报和野蛮捕杀苏方谍报人员

1934年8月，伪警务厅的日军特务为了调查苏联东库伊比雪夫卡到海兰泡之间的军事设施，强迫住在黑河六道街的1名中国人（农民，兼营牛奶，与苏联妇女结婚，年约45岁左右）潜入苏方上述地区。此人始终没有回来。

1935年初至同年6月，他们又强迫住黑河街鸞屋旅馆附近的1名中国人（男性，45岁）潜入苏方精奇里江河口的造船厂，收集该厂生产能力及周围的军事设施等情报。此人返回后，他们又强迫他到苏方收集东库伊比雪夫卡至海兰泡之间的军事设施情报。后来，把这些情报报告给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和伪新京

警备司。

1938年2月，伪瑷琿县警务局三卡特务股长得到一份与黄旗营子居民田某入苏事件有关联人的情报，便报给上司。3月，伪警务统制委员会派伪黑河宪兵坂口军曹逮捕苏联“地下工作人员”、瑷琿城国民学校教师孟某（年二十多岁，男性，瑷琿县松树沟人），被宪兵队利用派往苏联，后下落不明。

1942年后，保安局的特谍班加强了情报网。对内：由于情报活动的联络员多数公开，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不能深入到民众之间探索秘密的抗日组织，所以，保安局选择秘密的联络员。他们物色的对象是在群众中有些威望的，过去与警察、军队、官府无关系的，有一定职业和财产的人。采用掌握其弱点胁迫其服从或者利用其怨恨、爱情等关系施以恩义胁迫其服从。对外：积极物色派往苏联的谍报人员。选择那些县内有家者（必备条件），曾在苏联住过，通俄语者，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的。采取的办法，以利益引诱和以武力胁迫。

另一方面，对从苏联来的谍报人员，送交国境特务机关，审讯后送到哈尔滨特务机关。苏联派来的密侦，被捕后经考查，能利用的被派回苏联，不能利用的就地杀死，或者送陆军医院作为军医的试验品，或者利用“龙江之口”在晚间进行秘密杀害。

1942年1月，瑷琿县特务主任多胡逮捕一名苏方谍报人员，并认为没有利用的希望，经黑河省特务科长批准给以严格处分。多胡于夜间把被害者带到结了冰的黑龙江上，打开冰洞用手枪杀死后投入冰下。

1943年4月左右，多胡在黑河街邮政局附近逮捕了1名苏联“地下工作人员”（中国人，男性，40岁左右）。经严刑拷打，往肚子里灌水，6个月后将此人杀害。

1943年夏，瑷琿分室根据没有利用的理由，将两名苏方谍

报人员（中国人）送到日本陆军医院供军医做实验材料用。

1945年2月，原住瑗琿县小黑河的一名被害者，年约30岁。住小黑河时，因与邻居发生纠纷，于1941年冬奔入对岸，越境入苏联。一年以后，约于1943年初以苏联密侦身份潜入黑河。到朋友家后，居民怕被发现乃劝他去自首。他自首后被押在收容所里。寺尾对他进行分化，作为国内间谍来对付苏联间谍的内线。1944年春把他分配到山神府。此人到山神府后不听从保安局的命令，并使警察队与宪兵队发生一些磨擦。中村与寺尾商量，认为已没有利用的价值，便命令部下秘密杀害。

（摘自《黑河文史资料》第四辑）

日寇在东北特务活动的片断

温如春

回忆东北沦陷后，日寇非常猖狂，真是恣睢暴戾、为所欲为。在军事上施行杀光、烧光、抢光；在经济上施行掠光、搜光、刮光的两个“三光”政策；在政治上则是特务密布、间谍横行，玩弄各种心毒手狠的花招，残害群众。当时东北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往事，今日回首，记忆犹新。

我于1938年，在伪满黑河警备队任翻译时，有一同学叫沙成福，他对日寇特务活动，有些了解，尤其对日寇特务机关内部情况，更为知情。据他和我所说的，略述于下：日寇特务机关，设有“特要视察人课”，他们把沦陷区的各界人士分为三类：一类是特殊阶层的，就是荐任官以上的人；二类是委任官级的人；三类是地方士绅。对上述三类人，进行特务跟踪，暗中监

视。凡是日常生活或工作中，触及日满关系的，都列为要视察人范围内。稍有不利于日满的言行，如被警宪特发觉后，便以思想不良，或反满抗日论罪。进行逮捕关押在“辅导院”也叫“思想矫正院”。通过审讯、非刑拷打，百般折磨后，送到矿山煤洞，或军事工地，强迫劳动。其目的是将他们置之死地。他们的口头禅是：“统统的死了顶好”言外之意是：整死几个中国人算什么？死的越多越好统治。此外，他们还感到单靠伪警宪特还不足的，有时达不到目的的。必须利用大批特务人员，进行伪装潜伏，采取形形色色各式各样办法和措施，才能更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的。

特务联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火车站前，或各种宣传商标，如“人丹”或胃药瓶等，外部人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推销商品，其实人丹上老头的胡须和胃药瓶的左右放法，以及瓶口流出药片多少等都是特务暗号。此外，比较重要情报，是利用日寇神社作基点传递的。日本神社多半建立在大中城市，神社的和尚，全受特务机关领导，并领取经费。一但有要事和特务人员相商，或交待某些任务，则由和尚持鼓走街串巷，边走边敲，口中念念有词，鼓声有快有慢，并有长短几下之分，装成诵经求佛的假相，实际是召集或通报当地驻在的特务人员的暗号。

再如，日寇在各地建立的协和会：省市设协和会本会，县设分会，村设支部。组成人员：省市是官僚财阀，县是地主劣绅，村是土豪恶霸。其中设有会长、支部长、助理、委员等。其任务对外是群众组织，美其名是向日寇“宣德达情”；对内是有实力的日寇帮凶。为了效忠日寇，维护汉奸的统治，他们不择手段地残害中国人民，动辄以思想犯、国事犯……等罪名，秘报日寇。由此可见，协和会的成员，实属罪大恶极的汉奸，人

们称之为“协和坏”。

日寇的特务组织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对内部人员的监察，也是非常秘密的。如关东军内部设有秘密“内谍哨”。这些内谍哨，负责对官、兵的监视，如发现问题，直接向关东军参谋本部秘报。他们的待遇级别，全系二等兵或一等兵，由关东军参谋本部“内谍课”负责领导，即使高级官佐，也不详其任务。他们享受优厚待遇，每月工资约等于少佐薪饷，如能报告特别重要情报时，还给予特别奖金。为了绝对保密，他们的优待薪金或奖金，均不直接发给本人，由关东军参谋本部直接寄给其家属以防泄密。内谍哨人员，绝大部分系皇亲国戚，所谓“皇带子”。认为这部分人忠实可靠，绝对保密，忠于天皇。被征募后在国内先进行训练，然后有重点的，派往关东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等任职。他们到军队里完全担负勤杂兵工作。如汽车兵、传令兵、号兵、军犬军鸽兵、伙夫、马夫等。从表面上看，这些职务都不太重要，但在活动上大有便利条件，能经常接触各级人物，便于达到和完成内谍任务。但关东军对他们的行动，也不时进行秘密调查，如发现失秘行为者，轻则调离部队，重则秘密处死绝不宽恕。

日寇内谍活动，除利用皇亲国戚外，还利用少数朝鲜族少女，从事内谍情报工作。在日寇联队以上的军队中，都设有随军妓院，（通称酒保慰安所），征集朝鲜族少女，年龄均在18岁以上至25岁的，身着军服，不带阶级，经过谍报训练后，派往各部队的。其成员分三等：一级妓女接待佐级以上军官、二级接待尉级军官、三级接待士兵，士兵每周准许去妓院一次，不许住宿。尉级以上军官也定为每周一次，可以住宿。佐级以上军官不限，这样少女们在日常接触中，可以了解掌握一些官兵的言行，遇有轨外言行，可以直接秘报指定的内谍参谋，汇总

后再报告关东军参谋本部“内谍课”。妓女的待遇，一二级按尉官级别发给薪饷，三等按士兵薪额发给，每次月薪直接发给本人。但谍报活动费，则直寄妓女家属。由此可见日寇对特务人员的布署，真是煞费苦心，巧布罗网。不仅对反满抗日的中国人，予以严格监视，即对日寇军官士兵也百倍警惕，搜尽枯肠，想尽办法，防止意外发生。其用心之微，真是出人意料呀！

（摘自《锦县文史资料》）

抚松县日伪特务组织及其罪恶

李宗尧

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加快侵略步伐，镇压反满抗日武装力量，扑灭人民的抗日烈火。他们一方面出动重兵，大举武装“讨伐”和“围剿”，一方面在敌占区纷纷建立起密如蛛网的特务组织，并网罗当地一些民族败类，为其充当鹰犬。内外敌人互相勾结，对抚松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自1936年3月1日始，日寇基于其反动的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在伪抚松警务局内，成立了一个以日寇为主体的特务组织——特务股。该组织隶属于特务局领导，受省警务厅特务科的指挥。

1937年4月至1938年2月，为了加强特务活动，扩充特务力量，日寇又在县内各警察署专门设立了一批特务组织——特务系，如：伪抚松县警察署特务系、伪万良镇警察署特务系等共有6处，这些特务系都隶属于抚松县警务科特务股直接领导。

为了配合日寇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所谓“讨伐”和“围剿”活

动，日伪抚松县警务科，在日伪通化省警务厅的命令下，又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和1940年10月至1941年3月，先后办了两期“特搜班”。该组织也隶属于警务科特务股直接领导。

日寇为了加强特务力量，进一步实施其法西斯统治，从1936年12月，到1939年9月，先后在抚松又组建起“协和会东边道特别工作部抚松临时工作班”、“通化独立宪兵队抚松派遣宪兵驻在所”、“新京治安部警务司金特别工作班”、“通化省警务厅富森工作班”和“长岛工作队”等五六个反动的特务组织。

上述各种特务组织虽然名目繁多，各具特点，但它们的活动任务都是一致的：通过各条渠道、各种手段，搜集我党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掌握抗日联军和抗日团体以及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镇压、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群众团体；分化、瓦解我抗日联军和群众组织；策反、“讨伐”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屠杀广大中国人民。在特务分子中有一种“密探”（也叫“密侦”），他们分布在各个角落，充当特务头子们的“眼睛”和“耳朵”，起助纣为虐的作用。

一、分化、瓦解、策反抗日联军和反满抗日团体

金昌顺是日伪“新京治安部警务司金特别工作班”的特务头子，在瓦解抗联组织、收降纳叛的反革命活动中，向日寇大献殷勤。1939年7月，金昌顺把“抗日独立团”投降过来的崔洲峰和他的部下，带到了伪新京治安部警务司，编成了两个特务组织叫“金特别工作班”和“卫队”。他们的活动任务是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收降和劝降，同时还要配合日寇的大部队，向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讨伐”。

这年秋天，金昌顺又把前东北抗日联军的“万顺”收降下来（万顺的原名叫丁殿毓，参加抗联以前就是个大土匪）。金昌

顺把叛徒编到“特别班”的“本部”。又把“万顺”的部下编到“特别班”的“卫队”。在特务头子的直接指挥下，以“万顺”为首的“特别班”于1939年春，在濛江县收降了以金贤为首的8名抗联人员。不久，在抚松又收降了一批抗联人员和土匪，共有三百多人。“万顺”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员编入了特务头子崔洲峰带领的“讨伐”大队。

在分化、瓦解我抗日队伍时，敌人惯用的一种手法是“反间计”，他们把收降下来的兵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再把他们派回到原部队，让这些叛徒从内部分化、瓦解我抗日力量。“万顺”就曾经被特务头子金昌顺，派回到“抗日义勇军”中，阴谋劝降李洪斌司令员，当即被李司令处决。

特务们还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招降纳叛，让这些民族败类替他们充当爪牙，破坏抗日力量。如：“长岛工作大队”于1940年1月，指派投降他们的土匪头子“压五营”负责，收降了金日成部下的林参谋长（林宇成）及其部下的一个机枪班，然后把林宇成带领的四十多人编成“第三特设大队”。任命林宇成当大队长。为了报效主子的恩德，林宇成积极从事收降、策反活动，心甘情愿地充当日寇的鹰犬。又如：日伪“通化独立宪兵分队抚松派遣宪兵驻在所”，于1939年夏季，在北岗诱降了抗联李司令部下的副官张玺臣，然后任命这个叛徒当了特务组织的副队长。同年秋季，这个叛徒为了表达他对主子的忠心，带领一批特务在北岗收降了以李××为首的3名抗联战士，收缴了大枪两支，子弹40余发。

为了大量分化、瓦解抗日力量，特务们还利用了“以毒攻毒”的办法，让一些叛变分子当密探，在老百姓当中大肆进行特务活动。日伪“抚松警务科特务股”以日本人长岛为首的宪兵队，在特务股的配合下，于1939年收降了抗联人员崔九奎。特

务们为了扩充反动力量，又把以崔九奎为首的一批叛变分子发展成为密探，然后把他们打入老百姓当中，让他们从内部从事收降和策反活动，借叛徒之手为日寇效劳。

破坏抗日组织、抗日团体，也是特务分子们罪恶活动的重要内容。从1936年12月末到1937年3月，日伪在抚松建立的“协和会东边道特别工作部抚松临时工作班”，虽然只活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但却破坏了抗日联军领导的党的地下组织“祖国光复会”（又称“反日会”），逮捕并杀害了大部分会员。

二、镇压、逮捕和屠杀我抗联战士，残害无辜百姓

特务们为了全力效忠日寇，对那些坚持抗战、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大肆阴谋杀害。如：驻在抚松县境内的特务，于1936年4月，命令特务分子白日升，伙同日伪汉奸南关区区长刁廷禄，逮捕了抗联战士李大昌（李士武），严刑拷打，然后枪杀。1937年，特务们配合警备队，大肆屠杀抗日武装力量，仅被特务头子宫川正吉（日本人），一次亲手杀害的抗联战士就有3名。在特务股主任门长愚指使下的特务分子赵德茂等人，在抚松城南杀害了1名抗联战士，并将烈士的头颅割下来，送到警务科去邀功请赏。特务分子刘忠海，把爱国人士唐云起逮捕后严刑拷打，然后交给日本人，又被日本人惨无人道地投入狼狗圈里，把唐云起活活地咬撕吃掉。

敌人为了切断抗联的军需供应途径，控制革命群众同抗联之间的联系，对广大人民群众横加摧残。1940年8月，特务们以“通匪”的罪名，把群众徐志藩抓到了警察局，给他上了“吊挂”，悬在梁柁上，由一群特务们用木棒对徐志藩轮番拷打，致使被害人昏死3次，而且终生致残。

1941年3月，特务分子解福堂、刘忠海、黄德才等人，也

以“通匪”的罪名，把农民王有奎抓进警察局，先是一顿毒打，再上大挂，然后灌辣椒水，最后投入大狱。

1938年中秋节，群众张振有给抗联战士们代买了一批过节的物品，被抚松万良镇警察署的特务分子汪树林发现后，马上把张振有逮捕了。除了没收张振有买的全部物资，还把张振有毒打一顿，险些丧命。同年8月8日，抽水洞警察署的特务分子李永亭把三十多名曾经给抗联买过粮、盐、胶鞋等军需物质的老百姓，抓到了警察局，不仅毒打，而且灌凉水、灌辣椒面子、压杠子。把张福山等多人打成重残，不久绝世。甚至有两名妇女，也遭到了特务分子叶荫林和李月祥灌辣椒水、压杠子的酷刑。

1939年，特务股主任石德玉，指使特务逮捕了向抗联提供情报、供应物资的二十多名群众，施以各种酷刑，其中有十多人被判了多年徒刑。在抚松西边荒沟岗上，特务们抓去了给“岳团”筹备给养的群众罗振山，酷刑审讯后，特务们把罗振山交到宪兵队，惨遭杀害。1940年6、7月间，特务头子门长愚，命令特务分子李树广，以“通匪”的罪名，在东岗、北岗等地逮捕了三十多名同抗联有关的群众，遍施各种毒刑。贫农柳中林被打昏过去7次，左肢终生致残。贫农王文进也被活活地打死，许多人被投入监牢。

日寇为了掠夺东北的资源，巩固其反动统治，补充侵略战争的消耗，需要大批中国人充当苦力，替他们去卖命。而特务分子便尽力效忠主子，以“强化地方治安”为名，在各地大批抓“浮浪”（日本统治者对无职业的中国老百姓的鄙称），以充当日寇的牺牲品。日伪“抚松东岗警察署特务系”系长解福堂，于1941年农历五月份，曾参加了抚松伪署长召开的“抓浮浪”会议。会上，特务们研究并确定了搜捕“浮浪”的各项措施，并

且提出了搜捕名单和重点抓捕对象。开会的次日，由外勤特务黄德才等人，到各处抓了36名群众，如杨福清、宋日起、于庆之等无辜的老百姓。其中有6人被送到四道沟煤矿干活。在一次煤矿冒顶时，有的被砸成重伤，有的被砸死，有的下落不明。1943年春，特务头子姜永清和他的爪牙李升林等人，受伪“县特务股”的命令，在各地抓了四十多名“浮浪”，审讯、毒打之后，把刘玉山、刘海山等十多人，送到了大栗子铁矿去当劳工。1941年6月和1942年4月，特务系的鹰犬们，配合县警察大队，在全县境内先后进行了两次大搜捕，共抓走“浮浪”一百一十多人，分别送往西安（辽源）煤矿和大栗子铁矿去当苦力。1943年9月，为了抓劳工，特务股配合县警察署的特务们，在全县进行了一次突然性的大搜查，抓走了八十多人，送到大栗子铁矿去当劳工。

特务们对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横加镇压、迫害。经常以“政治犯”、“嫌疑犯”、“通匪”等罪名，大肆逮捕、监禁和屠杀。1942年3月，特务系主任姜永清与特务李永亭等人，协助伪辉南“特搜班”的特务们，在大苇沙河口、东大屯等地，抓走了金光源、崔凤善、车云学等13名朝鲜族居民，并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毒打、审讯了一个多月，车云学被折磨得死在奉天（沈阳）的监狱里。1940年年末，抚松县特务股的全体成员积极活动，配合辉南县“警务科特搜班”，先后3次在抚松县境内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抓捕了一百三十多名朝鲜族人，并押送到了辉南警务科去严刑拷打。又在1945年6月，在警务科副石渡的亲自指挥下，以怀疑是金日成领导的“朝鲜革命（独立）团体”的罪名，在抚松全县境内逮捕了三十多名朝鲜族人，并对他们施以惨绝人寰的酷刑。其中有3人惨遭杀害，大部分人被打成重伤或终生致残。

为了配合日寇的“奴化教育”、“强化教育”，特务分子们在教育界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如：1944年6月，特务股受通化警务厅的命令，由股长、系长博夫，亲自率领特务分子董秀儒、宋增安等人，以“反满抗日”的罪名，逮捕了伪国高的教师别善会，严刑逼供后，又把别善会送到了伪新京高等法院，判处了8年徒刑。1945年6月，特务吉岗刚三（日本人），带领特务分子李成一，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在伪国高抓去了一名教师（姓名不详），还有李时好、赵应国等六七名伪国高的学生，严刑毒打之后，投入监狱。特务分子在教育界制造白色恐怖，弄得广大师生终日惶惶不安。敌特分子利用皮鞭、棍棒和屠刀进行血腥的镇压和屠杀。1940年冬季，特务头子门长愚指使特务赵德茂带领一批特务分子，残酷地镇压了砬子河伐木工人的罢工活动，并抓走1名妇女做人质，用棍棒和屠刀逼迫工人上工。

至于特务们以“经济犯”、“嫌疑犯”等各种罪名加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1940年春季，抚松“特务股”的全体成员，协同其他的特务组织，以“抓抗联”为名，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搜捕，把十多名“可疑分子”抓到了特务股去刑讯拷打。同年9月，特务分子翁振才等人以“种大烟”的罪名，把住在双沟的农民郭修礼及其岳父老孙头抓起来，毒打一顿之后又送到警察局，把他们判了6个月的徒刑。另外，特务们还把一些有抗日嫌疑的人定为“要视察人”，对这些人严加监视，跟踪盯梢，不准他们随便行动。仅特务分子李永亭一人，就监视着三十多名“要视察人”。

三、横行霸道、敲诈勒索、鱼肉百姓

特务分子们除了政治上、思想上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迫害而外，在经济、物质等方面也大肆勒索，无情搜刮，中饱私

囊。如，1937年5月16日，特务分子兰心帮，在抚松城南夹信子，以搜查“大烟犯”为名，抓走了一个姓魏的老百姓，向他勒索大烟。姓魏的交不出大烟，就被特务们暴打一顿，把他打成了重伤，不久就死了。同年10月份，特务分子王德懋又在夹信子李家碾房没收了十多两大烟。特务赵德茂听说老营沟一家老百姓有大烟，于1940年7月，就带了十多名特务到老营沟，杀死了一个老百姓（姓名不详），不仅抢去了六十多两大烟，还抢去了这个死者的一百多元伪币和一百多块现大洋。

以“经济犯”的罪名向老百姓敲诈勒索，也是特务们惯用的伎俩。

1945年2月，抽水洞警察署特务系长姜水清，指派特务分子吴殿军到太平村，以“经济犯”的罪名，没收了农民赵金春的三百多斤大米，并给伪警察和伪职员们私分了。1944年12月，特务分子董秀儒也以“经济犯”的罪名，抓去了抽水乡兴盛店的经理马善一（又名马关龙）把他关押16天，又勒索去伪币五百多元，猪肉六十多斤，木钟一台。

以“通匪”罪名敲诈、勒索老百姓，也是特务们常用的手法。1942年春季，东岗警察署特务分子李文正，以“通匪”的罪名，毒打了一批无辜的百姓，然后罚款。在东岗北门，又以“给抗联送干粮”为借口，把农民冷绍英毒打一顿，并全部扣留了冷绍英给亲属的食物，让特务们私分了。1940年夏季，日伪“通化独立宪兵分队抚松派遣宪兵驻在所”的特务分子李鹏程，以“通匪”的罪名，抓走一个姓王的老百姓，毒打一顿之后，又把这个老百姓自家拣的四百多斤蘑菇全部没收、私分了。

特务们还以“私藏武器”为罪名，在抽水乡小沙河子，由特务分子宋增安、杨锡生等人，收缴了农民护田看家使用的七支土炮。

除此之外，特务们还通过各种巧立的名目，向老百姓敲诈勒索，刁难、毒打，或罚以财物，或跪石头子儿。更有些作风恶劣、道德败坏的特务分子们出入赌场，奸污良家妇女，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怨声载道。

综上所述：日伪在抚松统治时期，特务分子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为整理、撰写这份历史资料，我查阅了抚松县公安局保存的一批日伪统治时期的敌特分子的档案材料。所以本文记载的内容，是根据敌特分子的坦白、交待、人民群众的揭发检举以及专业人员的文字材料整理而成。

因松树镇已不属抚松县管辖，所以，日伪统治时期松树镇警察、特务的档案等材料，没有保存在抚松县公安局，不便于查阅，在这份材料中没有涉及到。

在收集、整理这份材料的过程中，承蒙抚松县公安局李宝仁科长和陈敏同志给予了积极、大力的支持，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摘自《抚松文史资料》第5辑）

伪舒兰县的特务组织和活动

苗有方

日伪统治者为维护其“满洲帝国”在我国东北的统治政权，在东北各地组织了庞大的警察队伍，以实施其法西斯高压统治。其中特务警察，就是与日伪军警的武装镇压和法西斯统治相结合，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进行秘密活动的组织。据我所知，

伪舒兰县的特务警察组织及其一些活动，记述如下：

伪舒兰县警务科最初设有特务股，上属省警务厅的特务科，下在各警察署设有特务系，全县警察署专职特务十几人。舒兰县警务科特务股里专职特务有六七人（不包括秘密的兼职特务），特务股长是日人，先后是监督警尉田中治作、黑龙江雄、高昌××、森山美术男等。特务股里分特高和特务两个系。

特高系的任务是直接维护日伪的统治政权，对预谋暴动、颠覆政权等的反满抗日的思想或事件，进行侦察或暴力镇压。特高系的组织，直接由股长（日人）兼管。一是特高侦谍，有监督警尉李洪彩，还有警尉于廷臣。这两个人当时均以免职为名，掩盖其警察身份，进行不公开的秘密活动，和特务股长进行直接联系；二是有密探（俗称特务）数人，也是和特务股长（日人）直接联系。如：在二道河子（现在的吉舒镇）煤矿有个50来岁的日本妇女（早在民国年间嫁到中国人姓刘的，家住二道河子），特务股长给她拿本钱，在二道河子作买卖掩盖身份，做密探活动。在伪舒兰县公署传达室当传达长的房金臣，在伪朝阳村居住的杜弼臣（那时50来岁）等，也是经常和特务股长联系。在舒兰警察署当警长的庞凤歧也说是免职了，但也常和特务股长接触。在警务科当翻译的朱福喜、于贤贵（关东州人）也常和特务股长密谈。当时我们特务股的一些人认为他们也是为特务股长当密探的人。

特务系的任务是从事一般性的特务活动，预防和发现对日伪政权和“友邦”日本进行反抗的思想或活动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特务系设主任一人，先后有监督警尉沈润田、森山刚吉（朝鲜人）、江源××（朝鲜人）、王友帮等，还有警尉光原敬夫（朝鲜人）、林竹隐、苗有方、赵荣阁、张玉峰、警长尚福道等。

特务系的日常活动，主要是对各种宗教信仰、社会团体和

人民群众中有威望的人物进行监视。再就是搜集人民群众对日伪所施行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影响情报，逐级上报做出决策。如：粮食出荷（强制征粮）、经济统制、征兵、征军马、征劳工、满拓强占农民良田、在学校中推行日语、民间流言蜚语等。甚至上映带有政治性的影片时，各阶层的观众人数和言论、反响等，也要有统计数字和情况，及时上报。为此，任何机关在施行能引起人民反抗的一些条文或活动之前，都必须行文申报到警务科特务股备案，以便特务股深入实际进行特务活动。特务系建有如下的名册和台帐：

一是《要视察人名册》。对于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想的人物或有过激言论、行动的人物以及有预谋煽动暴动或其他危险人物等，都登记在这个名册上。除登记其自然情况外，每月还要定期或临时将其活动情况记入活动栏中。对于“要视察人”要秘密监视，如果其迁居了，或下落不明，就应及时上报和发手配公文（逼缉）。

二是《要注意人名册》。对于请愿、直诉上书以及过激言论行动者，都要登记在此名册中，以备监视其动向。还有《知名人士、地方有力者、知识分子名册》、特务警察认为有必要注意的人物和满系（中国人）官员，都要登记在此名册中，也是当作“要注意人”来监视其动向。

三是《宗教团体台帐》。在县内有参加基督教会、佛教会、道德会、家理教会（红帮）、慈善会等结社者，都要登记其团体名称、信仰、宗旨、活动范围和教徒情况以及其首领的姓名和简历等情况。凡是这些集团有集会传教等活动时，都必须在集会活动的前一天，向特务警察机关书面申报，得到批准方可活动，同时还要接受当地特务警察到会临监，并将其活动情况记入台帐活动栏中。

另外，平时如有多数人聚众，特务警察称之为“群集”。对此类现象，警察必须赶赴现场强行驱散。对于报刊、书籍等出版物和影片、唱片等的发行，特务警察都要检查、或者剪裁、或者扣押、或者上报进行制裁。对外国人居留的审批、国外旅行证的签发，也都由特务警察控制和办理。

总之，日本侵略者惟恐中国人民反抗，而设置了以日系为头目的特务警察，有明的有暗的，深入到各个领域，进行监视和镇压。

特务警察的活动，多是秘密进行。就是特务机关的行文，都是用双层信封，外层封皮写收件机关和收件首长收，内层封皮左侧印有“特务亲展”或“极密”两种戳记字样。收发室拆开外层封皮后，见有此种戳记，就必须直接送交特务股长亲自拆开。对记“极密”字样的文件，由股长亲自拆封处理。对只印“特务亲展”字样的文件，则由特务系主任拆封和处理。

特务股除上述一般日常活动外，遇有重大事件时，则临时组织特别搜查班，进行专项侦破活动。例如：1940年（伪满康德7年）7、8月间，活动在舒兰县东部金马一带山区的我抗日联军汪雅臣部，袭击了伪五常县山河屯的警察署，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弹药，同时带领一些金马的贫民百姓没收了山河屯永恒当铺的一些财物。事后，日伪统治者称此事为“金马事件”。为侦破这一事件，伪舒兰和五常两县特务机关，联合组成了一个特别搜查班。成员有舒兰县特务股的特高侦探于廷臣、特务警察光原敬夫，还有从舒兰和平安警察署抽调的顾云廷等人。这个特搜班是在伪舒兰区检察厅的检察官（日本人，绰号叫黑小子）的直接指挥下，在舒兰的金马和五常的向阳山等地进行大搜查大逮捕，一直到同年11、12月间，搜查才结束。被捕来的一些人，有些在舒兰警察署看押，有些关在舒兰监狱里，一些

无辜的百姓受到毒打和灌凉水等残酷的刑讯和迫害。最后，有4人被送进伪新京（现在的长春）思想矫正院关押，还有居民程殿奎和张云哲2人于舒兰被枪杀。

日伪统治者大肆宣扬什么“王道政治”、“人类必重道德”、“人类必重仁爱”，甚至在法律上规定“人民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等，都是帝国主义者惯用的政治骗局。从上述特务组织、任务、活动中，就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者的强权政治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政策。

日伪时期遍布各地的庞大警察队伍，是日伪统治者的御用工具。所谓皇帝陛下的警察官，就是地方的小皇上，人们都叫他们“警察阎王”。那时，警察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法律上还规定“监督警尉以上者，有司法警察官权力，有发拘引票（捕人票）、关押人的权力”。实际上，一个普通警察只凭《警察手牒》（警察身份证）就可以任意捕人。不但在管辖内、县内捕人办案，就是到外县、外省捕人办案也不需什么公文证件，真是人间的活阎王。

（摘自《舒兰文史资料》第二辑）

伪满黑河特务机关宣传据点——萨哈亮

王登明 郭世宏

萨哈亮是日伪时期一俄国式餐厅，位于江沿街，迎恩路西侧。它是根据黑河的历史名称“萨哈连”而命名的，在黑河特务机关直接筹划下，于1941年末至1942年初成立的。它的建立，是黑河特务机关随着“关特演”的推移，实施谍报欺骗宣

传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成立的目的

(一) 黑河特务机关以萨哈亮作为对苏进行宣传活动的据点。每年旧历七月十五盂兰盆会，黑河特务机关在此举办焰火花炮大会，萨哈亮成为焰火大会的楼台。届时，邀请日本北部防卫军高级将领参加，让其一边观赏焰火，一边饮酒赴宴。同时，让宣传班外围工作人员弗道谢也夫担任对苏的俄语广播宣传。伪黑河地方当局还诱惑黑河街内百姓都到平时不敢到的江边观赏，借此“真实形象”造型，宣传伪政权下虚假的“歌舞升平”、“物阜民安”的繁荣景象。一方面迷惑当地居民，另一方面欺骗海兰泡市居民，磨灭其反法西斯斗争意志，激起反战情绪和厌战心理。

(二) 萨哈亮餐厅以俄人的生活习惯修建的。因此对当地的一些白俄居民和特务机关露班（对俄工作班）的白俄特务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了满足，使他们死心塌地为特务机关服务。

(三) 以餐厅作招牌，豢养一些“黑特机”密侦人员，让其侦察所谓可疑的人。“黑特机”露班有时在此集会，有时白俄特务在配属宪兵的监护下，在萨哈亮门前渡江侦察。

(四) 以该餐厅所得利润作为“黑特机”国防献金的来源，支援所谓“大东亚圣战”。

二、成立的经过

黑河特务机关宣传班主任佐藤静雄中尉，首先拟制了一份在黑河建立宣传据点的规划和意见。由机关长武部松雄大佐审定后，报请哈尔滨特务机关批准。“黑特机”指派满班主任中森洙七到哈市物色有经营俄国餐厅经验的中国人，结果在“哈特

机”的介绍下，中森涤七与当时道里七道街口的迎春饭店经理孙景山等接洽，进行有关在黑河筹建俄式饭店的商谈，条件是：饭馆资金由孙景山等人筹集，有关俄式饭馆所需的一切物资，如白面、肉类、酒类、砂糖、食用油等，均由特务机关在现地或各地协助筹备。鉴于黑河系国境地带，一切人员往来证件及发送货物的公文、证明手续，均由黑河特务机关负责办理。孙景山等人来往于哈——黑之间的旅行护照，均由“黑特机”以临时嘱托的身份签发，由外地购入的各种特殊物资，如洋酒、罐头等，则以黑特机军用名义装卸。

三、人员接待

总经理：孙景山

副经理：张绪典

副经理：袁×成·兼厨师

赵叔和

会计：赵某

服务人员：白俄女招待舒拉、塔玛拉，另外尚有三四名，这些女招待都是经过哈尔滨特务机关审查而选派的。她们的生活待遇由萨哈亮支付照料，她们的身份表面上是萨哈亮餐厅的女招待员，也未列入“黑特机”露班外围工作人员的名单内，但他们的宿舍由“黑特机”调拨。她们往返于哈——黑之间的护照，亦由“黑特机”以临时雇用人员身份给予证明。但暗中，她们对各类顾客进行监视，发现“情况”及时报告给“黑特机”。

“黑特机”向萨哈亮直接派驻人员只1名，是“露班”外围工作人员廖尼亚，他当时的公开职务是看管本餐厅的顾客衣帽及携带物品，实际是“黑特机”用来监视顾客的特务。

萨哈亮餐厅不但是黑河特务机关宣传据点，而且“黑特

机”也以此接待过日伪时期的一些高级将领。如：1942年5、6月间，关东军情报部长柳田元三中将来“黑特机”视察，为期两天。1943年，柳田元三再次来“黑特机”视察。1944年5月，关东军情报部长大居明夫少将来“黑特机”视察，着重对黑河白俄居民作了动员，他并以情报部长身份，向白俄保证在任何条件下给予生活优厚待遇。1944年后，日本军国主义为巩固北部防卫，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亲临黑河特务机关召集北部防卫高级将领秘密会议。同年夏，满洲宪兵总团司令官关成山来黑河检阅。1945年初，齐齐哈尔13部队长阿南大将（西部防卫司令官）在回日本就任陆相前，也来黑河特务机关视察并作机密指示。

（摘自《黑河文史资料》第4辑）

我所知道的日本大特务寺田利光

宝敦古德·阿必德

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乌尔金的翻译官、现在在日本奈良自由民主会馆工作的日本人冈本俊雄，最近写了一本书，名曰《一名布里雅特蒙古青年和一名日本青年的会见》。1981年，他将该书并信件几次寄给我盟海拉尔、鄂温克旗、陈旗等过去曾认识过的人。在此中日正常关系已经建立，中日友好关系日益发展的时候，这本书却引用了伪满在呼伦贝尔的日本大特务寺田利光的日记。继续沿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观点，仍称寺田利光为“呼伦贝尔的父亲”。严重地歪曲了事实真相，令人愤慨。为此，完全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寺田利光部分史实写出来，还

其历史本来面貌，以正视听。

解放前，在海拉尔市头道街公园里矗立着一个日本军人的大铜像。他就是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呼伦贝尔之父”，而实际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特务寺田利光。

寺田利光生于日本明治22年（1884年）7月5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分配到日本军队里当了尉官。日本的情报机关为了培训到蒙古地方搞特务活动的人材，选送他到日本东京外语大学，学习蒙古语和俄语。他精通了蒙古语和俄语，还会说一点汉语。

1918年至1919年，14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消灭刚刚诞生的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蜂拥入侵；日本也派遣了侵略军队，称之为“西伯利亚出兵”。寺田利光也参加了这个侵略军，并来到海拉尔，又去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他正式来到海拉尔是1927年，身份是“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嘱托”，实际是日本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自称是五等高等官，可能是少佐（少校）官衔。关于当时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出国后直接来到了哈尔滨，同哈尔滨的日本人安藤联系后，滞留了一个时期。和过去在哈巴罗夫斯克认识的俄国朋友也见了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于1927年冬天来到海拉尔，在日本人开设的松江旅馆定居下来。他在日记里写道：“在这里雇了一名廿多岁的汉族仆人。这个人过去当过土匪，和一个日本妇女结过婚，是个可靠的人。”

寺田利光在海拉尔定居后，就积极开始了特务活动。他在日记里说：“我每天上街散步，平常穿中国服，对汉人说我是蒙古人；对蒙古人说我是汉人；对俄国说我是汉人。”又写道：“有一天，我在公园里坐的时候，有两个俄国人在那里坐着谈，其中有一个人问我，你懂俄国话吗？我回答不知道。于是他俩

就随便谈起苏联西伯利亚的一些情况。”

1928年的夏天，他又和当时的海拉尔国民党军队的长官发生来往。他写道：“我认识了海拉尔的镇守使和他的参谋长。这位参谋长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我给他的儿子教日语。”这样，寺田利光逐步地扩大了他的活动范围，而且把手伸进了牧区。并且公开了日本人的身份，又增加了一些日本特务人员，如猪口。以后又来了一名精通蒙古语的日本人。他还利用从苏联逃跑出来的白俄军官阿塔曼、西苗诺夫、巴其西耶夫等人 and 他们的部下为其服务，唆使他们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搞破坏和侦察活动。在后期他特别注意呼伦贝尔地区的上层人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和呼伦贝尔都统衙门的大官们交上了朋友，我邀请他们到家里作客，也去参加他们较大的盛会。额鲁特旗总管凌升和布里亚特旗总管乌尔金等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了。乌尔金和我是1927年认识的，他赠送了我一匹带鞍子的好马。”寺田利光在呼伦贝尔地区还收买了一些当地的流氓分子如汉布丁、桑巴拉、沙拉、那木斯来、宝彦等人，为他搞特务活动。寺田利光这个狡猾的大特务，如果感到他的走狗有一点不可靠时，就毫不留情地杀掉。比如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多次去蒙古和苏联搞破坏的沙日、那木斯来，就是在阿尔山附近被日本人所暗杀。

1932年冬，苏炳文军队逮捕了寺田利光。但是，经呼伦贝尔蒙古官员说情，两个月就把他释放了。此事他在日记里写道：“额鲁特旗总管凌升和布里亚特旗总管乌尔金是救命恩人。”

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完全占领了呼伦贝尔以后，寺田利光彻底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是日本陆军的现役军人中佐（中校）。日本政府授予过三等勋章，不久就升到了大佐（上校）。呼伦贝尔的一切大权统由他掌握，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工作太

忙了，有三个身体也不行。我有专用秘书，还有寺田公馆，我的公馆门前日夜有岗哨，我已经成了呼伦贝尔的王爷，有人称我是‘呼伦贝尔的父亲’，我决心为了满洲国，为了蒙古人而干，要为日本帝国打下不可动摇的牢固基础。”

日本侵略军占领呼伦贝尔地区后撤销了原来的副都统衙门，成立了伪兴安北分省公署，任命原额鲁特旗总管凌升为省长；又成立了伪兴安北分省警备军司令部（后改为第十军管区），任命布里雅特旗总管乌尔金为伪司令官。这些都是寺田利光的安排。他自己当了日本特务机关长兼伪兴安北分省警备军司令部顾问。因此，日本当局称赞他的功绩，称他是“呼伦贝尔的父亲”，而他的野心更大。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当了蒙古的大王爷和‘父亲’了。但是，我等待着指挥军队，进攻外贝加尔地区时期的到来。”又写道：“我到新京（长春）会见了关东军司令部小矶参谋长，介绍了呼伦贝尔的王爷情况。”

1935年1月，贝尔湖东部哈尔哈庙地方发生了武装冲突。在同年7月，寺田利光就亲自去贝尔湖北部阿斯尔庙附近搭帐篷，住了几天，详细地调查了该地区的地形和其他情况。他去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家属，为一般的旅行者。当时一起去的还有他的女儿寺田英子，这在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的涩谷大佐指挥的机械化部队，就是经由此地突然入侵蒙古边境的。而后被苏军全部歼灭。这件事也是寺田利光特务活动的阴谋产物。

1937年7月，寺田利光因患脑溢血死去。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纪念他的侵华功绩，在海拉尔头道街公园里塑造了他的铜像，并称他为“呼伦贝尔的父亲”。但是，中国人民都知道这个铜像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者，是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大特务。日本投降后，海拉尔人民早已把

它砸得粉碎。

(摘自《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辑)

“东边道特别搜查班”

杨凤桐

伪满康德2年(1935年)杨靖宇将军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活跃在磐石、桦甸、柳河、抚松等地,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者除派遣关东军、伪军警组成讨伐队外,又处心积虑地拼凑了一个特务组织:“东边道特别搜查班”,设在磐石县黑石镇内十字街南路西保甲所院内。特务头子是野崎指导员,下边还有个汉奸队长。翻译官外号“张大骂”,这小子是掌管“生死簿子”的,让谁死,两句话甭想活。里边的特务有二十多个,如外号“林大巴掌”、“徐大马棒”和降匪“滚地雷”、“黑虎”等。当时群众把这里叫“阎罗殿”。

这个特务机关,将抓来的人随便杀掉,他们叫“拉大脖子”。那个日本人野崎,兽性大发时战刀一挥就人头落地,然后挂在辉发河南沿大树上,有时挂在南卡子门上,故意让走路人看看。隔不上三四天,就又挂出几个人头来。由于这个特务机关随便杀人,那些小特务就大发横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稍不随其兽意,就给扣上“反满抗日”、“通匪”的罪名,横加残害。有钱的可以免死,没钱的就被杀头。即或不死,也落个终身残废。那年月杀个人还不如杀个小鸡,特务们自己也说,杀个人好比捻死个臭虫,那算个啥。据我所知,从成立到撤销仅2年7个月的时间,就杀了一百多人,打伤致残的不计其数

了。

搜查班的院子很大，四周用青干柳夹的杖子，杖子外再拉上铁丝网，唯恐被抓去的人逃跑。

数九隆冬，天刚亮，就把所有捕去的人赶到院子里集合，一声口令，让自己把衣服脱掉，赤身露体坐在院子里。特务们用雪把每个人培起来，只露个脑袋，特务们管这叫“打坐”。几分钟后，一喊口令就都站起来，在院子里转圈跑。特务在后边用鞭子、木棒赶着。谁若是跑慢了，就挨鞭子抽、棒子打。跑有半小时后，再赶着往江沿跑。到辉发江中心冰上，又命令都跳进冰窟窿里“洗个澡”。出来后北风一吹，成了冰人。特务们管这叫“粘糖葫芦”。出来后，还得跑步。一直跑到冰化成水才算拉倒。回搜查班后，才让穿上衣服。特务们说这是“早操”。

饭后9点多钟开始审讯。刑法很多，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大挂、“抽烟卷”、“坐火车”。叫声不断，惨不忍听。

伪康德3年（1936年）农历七月间，抗联的一个小分队13人，在江南王小沟村南林子里迷路了，好几天没吃饭了，饿得走不动，向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问路，找吃的。不料这个坏家伙假意答应送饭引路，而暗里却告了密，搜查班立即出动大批武装打手，很快将那片林子包围了。经过激战，抗日战士弹尽粮绝，全部被俘。关在当时黑石国民优级学校的教室里。其中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没绑也没关，日本人还带他满街走，还给他买吃的、穿的，大伙以为这个小孩或许不能杀。约摸过了二十多天后，忽然这些人都不见了。有人看见说，都弄到老鸱砬子砍脖子啦。砍完又都扔到江里去了，连那个小孩也没幸免。这时人们想起了，当初鬼子那么哄骗他，还是为了让小孩说出杨靖宇将军的活动情况，可是鬼子是一无所获，所以把他也杀了。据说这十几个人都是野崎亲手用战刀砍的。杀了那么多人

还没过“瘾”，最后又凶狠地用战刀一连砍倒好几棵小树才了事。那个告密的老汉奸，土改时被枪决了。

（磐石县政协供稿）

伪满特搜班在扶余的罪恶活动

常子荣 杨凤楼 陈翼 纪仲三

“特搜班”这个名字是群众给起的。因为他们负有特殊使命，直接由伪满洲国警务厅派来搞专案的，不受地方领导，地方有关部门也无权过问。因此，他们所做所为，地方政府只能听之任之，敢怒而不敢言。故群众称他们为“特搜班”。

记得在1942年5至6月间，江北三肇地区遭到了东北抗联徐泽民部队的袭击，许多日本人被打死，监狱被打开，放走了政治犯，警察的枪支全部被缴械，使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他们大肆逮捕和屠杀了无数青年学生和无辜百姓。我县和肇源是临县，仅一江之隔。因此，伪吉林警务厅就把我县沿江一带也列为抗联活动区，派来了以唐警尉、徐警尉补（外号“徐大马棒”）为首的特工队（即特搜班），以“整顿治安、回收武器、肃清匪患”为名，对我县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和镇压。并利用职权之便，敲诈勒索、贪赃受贿、霸占民女无所不为，群众恨之入骨。

这年秋天，特搜班来到扶余，住在“增盛谦”烧锅院内。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也就是10人左右。带队的是个日本人，叫河田警长，三十多岁，一脸胡髭，相貌很凶。执行的头子叫唐德华，是个警尉，榆树县人，也是三十开外的年岁，一脸奸笑阴

险。另一个外号叫“徐大马棒”，是个警尉补，三十多岁，大胖子，凶狠毒辣。他们不穿警服，只穿便衣，经常更换。上街打扮得怪模怪样，手提棒子鞭子，内插短枪，外挂手铐。他们首先找了一些“当地坏”，都是地痞流氓，做他们的爪牙走狗。有一个叫张廷芝的，是东园子张三麻子的儿子，他哥哥叫张廷玺，是扶余日本领事馆的捕快。张廷芝二十多岁，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净干坏事。还有一个姓曹的，是个下事的警察，其他就不认识了。总之，这些家伙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做了特搜班的帮凶，干了不少火上浇油的坏事。

特搜班活动的对象，一是上层人士他不惹，因为上层人士都有些权势，他们不在太岁头上动土；二是下层人们他不理，因为下层人们多是贫苦群众，在他们身上捞不到“油水”；主要找的是中层人物：在城镇商号的股东经理；在乡间是小地主、富裕中农，所说“闷头财主”。至于他们和当地警察的关系，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侵犯，避免是非。

特搜班的活动，首先利用他们的“狗腿子”搜集情报，提供线索。这些“当地坏”认为谁家有钱有枪，就带到“增盛谦”进行审讯。开始要枪，如果说没有，就是严刑逼供。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直到招供或者递到“门包”方能罢休。其次他们自己查访，上街挨门进去。如有礼貌不恭，招待不到的，就发泄其淫威。

他们把人带到“增盛谦”除用一般刑法外，还有什么“外五刑”，是把上衣剥光，用烧酒从头浇下，点着火一烧到底。“天庆丰”商号的郝凌阁，因为言语不周，叫郝趴在地上，学狗爬，学狗叫，舔吃地上的粘痰吐沫。“增盛谦”院内有个大贮水池，十冬腊月，让人跪在池内，从头往下浇凉水，叫做“挂蜡”。徐大马棒带人到旅店查夜，对男旅客无端刁难，对女旅客

百般污辱，笔墨难以形容。如徐大马棒看中一个姓李的姑娘叫李桂兰，叫人给他说亲，人们慑于他的淫威，怎敢不从。婚期撒贴子，“拉大网”大操大办，送礼的、随钱的很是不少。徐大马棒既得人又得钱，而群众对他们的兽行“怕之如蛇、恨之入骨。”有的人说：“日本人坏，他们更坏！”“这些东西不死就没天理！”

记得过春节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单位（福兴号），突然电话铃响，原是“益增号”来的电话，说唐警尉、徐警尉补叫我和阎村儒就去。当时我吃了一惊，不知什么事，但又怎敢不去。我和阎村儒硬着头皮来到“益增号”的客室，只见唐、徐倒在炕上正抽大烟呢，中间点着烟灯，一旁摆着鲜货。经理张天秩、程近辰在一旁招待。才知道唐、徐听说我和阎村儒俩会唱京剧，才把我俩找来唱一段，给他开心解闷。结果一直到了半夜，商号给他俩准备夜宵，我俩才告辞退出，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特搜班在扶余城内折腾了3个多月，到了冬季才转到长春岭进行他们的罪恶活动去了。

长春岭是扶余的一个集镇，地处农村，大粮户很多，他们的活动就更加疯狂了。住在“德丰涌”烧锅院内，并设立公堂。仍先找一些当地狗腿子，有李向亭、柳万连等10余人给他们出谋划策，残害群众，达2个多月。

那年冬天雪大，他们坐着雪爬犁深入到各村屯，所到之处就是一场严霜。他们到农村对富裕户进行搜缴枪支。如果没有枪就严刑拷打，灌辣椒水、煤油，烧头发、烧阴毛。把人翻倒在地，仰面朝天，脑袋放在灶坑内，用茶壶往鼻孔灌水，把人呛得鼻眼冒血，昏死过去，用凉水喷醒再灌。有个乔网户搭（鱼房子的东家）由于没交出枪来，打得遍体鳞伤，扣上反满抗日的罪名被枪毙。他们杀人，是把人用麻袋装上，拉到郊外，先

把人摔个半死，然后往麻袋打枪扔下就走。群众看到特搜班都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长春岭由于特搜班的进入，便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中。镇商务会为了缓和局面，特传旨意，命各店主事人，自选时间，主动去东烧锅院慰问特搜班人员，以表欢迎。但老板们私下相议论：讲欢迎，实属悻心；谈慰问，空问不如实慰。但实慰当如何进行？尚无定论。有人倡曰：听说班中喜欢玩麻将，吾等何不以此联欢？此议赢得了赞同，于是烧锅院内，顿时几场麻将，轮流不停。

上屋人们打麻将，欢笑取乐，而下屋内外，则愁云惨惨，不时听到：呼爹喊娘、叫苦连天的哀声。特搜班的恶棍们在拷打无辜良民。严冬腊月，有的人被剥去上衣，推至院门的正中井旁，或立或跪，狂徒们往被抓人身上泼凉水，使之“挂蜡”而后快。更有甚者，用热酒泼在人们的肉体上，然后用火点燃，火烧肉痛，满地乱滚，令人惨不忍睹。而那些恶匪，不准你喊叫，否则往口中扬草灰，眯眼、呛鼻、堵塞呼吸，痛苦何如！

屋内老虎凳上，还绑着一个，说他有枪，可他又拿不出来，只得任其折磨。旁边站一恶徒，提一水壶，水内掺合小米，他声嘶力竭地向被绑人要枪，被绑人说声“没有”，只见那人面兽心者，一手拽你头发，一手往你嘴里灌米水。使受害者头发直立，浸出血迹，真是人间地狱，惨无人道！

特搜班害人的消息传出去以后，远近震惊，人心浮动。有权势者，尚能静坐观变；无力抗拒者，或逃之夭夭，或深藏密隐，以避其锋。惟家中乏人，困于事务，则趑趄不前，惟有听天由命。

距岭街40余里，石桥附近，有姓吴者，家有一女，姿容秀丽，被唐警尉迷恋，意欲纳妾。托人通融，女方不允。恶贼乃

昧尽良心，诬陷吴家有枪，而逮捕女兄。将欲行刑，女知贼意，不忍胞兄被贼摧残，乃下定决心，舍身救兄。于是出面，向唐等明讲：“枪事我兄不知，问我好了。”匪徒一听，心暗喜，乃释其兄。之后，吴女含悲泪被唐逼走了。

这样一来，特搜班更觉得事事都有利可图，于是便天天在商号“天增太”内设赌，找一些士绅富户打牌，名为娱乐消遣，实际是“勒脖子”。被找的人不敢不来，如果合了牌，徐大马棒就破口大骂：“他妈的，让你们赢钱来了？”吓得人们不敢合牌，也就是只准输不准赢。来的人战战兢兢，每次赌博都得输下大量伪币，这个野兽方能称快。另外通过他们的爪牙，向遭事的人“卖关子”，说人情，以大量的伪币进行通融，可以免去皮肉之苦。当时群众说特搜班这伙禽兽：“不怕偷，不怕烧，就怕特搜班走一遭。”

每到晚间他们故意敲打商号的门窗，开得慢一点非打即骂。一次白天这伙人到商号“天发隆”，店员傅振刚迎接慢一点，徐大马棒抓住傅的头发，拖到“德丰涌”院内，用火把傅的头发点着，把傅烧得焦头烂额。从那以后，青年们不敢留长发。

住户夜间都是早早关门闭户，怕惹是非。小孩哭闹，大人就说：“唐警尉、徐大马棒来了。”吓得小孩都不敢哭。他们在长春岭周围活动那一段时间，受害者不计其数，简直是一场灾难。

(扶余市政协供稿)

大石桥的巡捕与狼狗

曹有训

伪满时，我在吉林省城税务监督署经理科担当用度股长。“九·一八”事变第二年的3月间，我的表兄边德昌由辽宁省海城县城西红草泡屯来到我家。说他让“洋拉子”（就是巡捕腿子）“拉”啦。这个巡捕腿子心肠狠毒，一般人谁都不敢着他的边，都称他“洋拉子”。我表兄说：要是被他“拉”着一定要喂狼狗的，所以我偷着跑到你这里来。他说：“大石桥的狼狗可厉害了，尽吃活人，日本宪兵和警察经常用活人做饲料。他们雇了很多巡捕，而巡捕又用许多巡捕腿子给他们探事跑道。这些巡捕腿子为非作歹，经常到村子里去，用栽赃的手段敲诈百姓。因为我们老两口收入多些，这个巡捕腿子就到我家敲诈，硬说有人告我是反满抗日，还说我有枪藏起来了。我说你能翻出证据吗？可是他不在我家翻，却把我带到屯的东南角的一个小庙里，从庙里拿出一支破枪。说告你的人说这枪是你藏的。我乘找个机会跑到你这里来了，请表弟设法托人救我的命吧。”

过了三四天，可巧税务科的李翻译到我家打麻将，我就把我表兄的经过对他说了。当时李翻译认为是敲诈。他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心傲气盛，就说，“不要紧，大石桥翻译我认识一个，明天拿我的信去，保证他没危险。”我又问李翻译大石桥那个狼狗作什么用的，为什么用活人喂呢？他说：“那些狼狗是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养的，是经过训练的，抓着的‘坏人’问成死罪的就喂狼狗。”我们一同打牌的3个人都问他：既然问成死罪

枪毙就完了，为什么要喂狼狗呢？他说：“喂狼狗需要用肉，用坏人喂就不用再买肉了，可以省许多钱呢。”我们又问他狼狗怎敢扒活人呢？他说这是训练出来的，日本人用谷草扎成草人，外边穿上衣服，然后把很香的肉，塞在草人的肚子里边，一两天不喂狗，在狼狗饿急的时候就把草人抛到圈里。狼狗闻到香味就扒草人的肚子吃肉，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在它饿的时候，不管真人还是假人，遇到就扒肚子。当时他也说这样太残忍啦，被扒的人不能当时就死，真不如一枪打死呢。

当天晚间，李翻译给我送来一封信，信皮写的是大石桥王巡捕亲拆。由于李翻译的这封信，我表兄才免遭于难。